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指導教授：邱坤玄博士

# 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政經競合
# —以結構現實主義分析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生：張君傑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七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摘要

國際經濟制度權力分配所形成的結構，是展現權力或實現利益的一種形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透過主導創設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B）構成國際經濟制度，確保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優勢地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日益展現出革新與完善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的強烈企圖心，尤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簡稱亞投行）從提出倡議到正式成立僅歷時兩年，並獲得亞太區域內、外之主要國家支持，反映出中國具備主導建構區域性或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的政經實力。本論文將從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利益、霸權等視角，探討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創設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目的、中國深化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美中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權力消長情形，以及中國創建亞投行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可能影響與戰略意涵，從中推論在美國掌控總體主導優勢的國際經濟制度下，中國試圖運用亞投行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力結構組建平行架構，爭取與其政經實力相符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等相對利益，藉以形塑安全環境、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和提升其大國地位，並在國際經濟制度結構下，與美國保持競合兼具的權力平衡的均勢格局，進而實現「兩個百年」的戰略發展目標。

**關鍵詞**：國際經濟制度、亞投行、結構現實主義、美中關係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form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may reflect influence of power and fulfill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cur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consisting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In contras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gradually shown a strong desire to reform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to explore the Sino-US strategic struggle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Sino-US relations caused by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realism. Based on the conducted analyses,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China aims to pursue the gains corresponding to its growing influence and have a bigger sa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Moreover, China also devotes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n balance of pow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establishing a parallel structure 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so as to accomplish its Two Centenary Goals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tructural Realism; Sino-U.S. Relations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 2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 24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25

第二章　美中在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互動 .....27

第一節 國際經濟制度之演進與戰略作用 ..... 28

第二節 美國創設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構想 ..... 37

第三節 中國運用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 ..... 40

第四節 國際經濟制度與美中關係 ..... 45

第五節 小結 ..... 49

第三章　亞投行之成立與發展 .....53

第一節 亞投行之創設源起 ..... 53

第二節 亞投行之制度設計 ..... 58

第三節 亞投行之發展現況 ..... 62

第四節 小結 ..... 7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章　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競合 .....75

第一節 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權力分佈之探討..... 75

第二節 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援貸條件之異同..... 82

第三節 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與美中關係的戰略意涵..... 85

第四節 小結 ..... 88

第五章　結論 .....9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92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96

參考書目 .....9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表目次

表 2-1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領導人對國際經濟制度的論述.....44

表 3-1　1979-2016 年中國經濟成長率統計表.....57

表 3-2　中國創建亞投行之發展紀要.....63

表 3-3　2016 至 2017 年亞投行貸款國家、項目及金額統計.....68

表 4-1　亞投行前 10 大出資額及投票權會員國.....79

表 4-2　亞投行域內、外會員國總數、總出資額及總投票權比例..79

表 4-3　亞投行域內、外前 5 大投票權會員國.....80

表 4-4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組織結構比較表.....83

表 4-5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援貸條件比較表.....85

表 4-6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投票權比較表.....8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圖目次

圖 1-1　中國「一帶一路」路線示意圖 .....16

圖 1-2　美「中」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國際制度的平行架構.....2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一、研究動機

強權國家的興起，除了軍事力量、經濟能力、地緣優勢或意識型態等因素外，亦可透過制度建構與創新來成就其霸權。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及國際制度的普遍建立與蓬勃發展，各國之間爆發直接衝突的風險已較過往降低，國際關係逐漸由軍事衝突朝向經濟競爭發展，運用各種國際制度劃定權勢範圍與限縮對手發展的和平手段是一種較為有效且可行的選擇。美國作為具全球主導地位的強權國家，通常將創設和主導國際制度視為確立和維護霸權的途徑和手段，中國等區域性強權則試圖透過國際制度來擴展及確保其國家利益。[1]由於經濟全球化與科技進步加深各國相互依存與合作互賴關係，國際分工與國際經濟重要性日增，各國之間的敵我界限漸趨模糊，並將保持本國經濟成長、提升國際競爭力視為核心國家利益，基於確保自身國家利益的前提，各國的對外政策多聚焦經濟議題，國際關係趨向規範化、制度化，國際制度逐漸成為強權國家基於權力對比格局形成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對各國行為規範的潛規則。[2]國家若要參與國際事務，就必須自我限制或讓渡傳統主權上的權利，遵守諸多條約、協議、規則和國際制度。[3]

冷戰結束導致兩極世界格局的解體，國際體系結構從美蘇「兩極對立」轉向「一超多強」發展，[4]美國更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確立其世界超強的優勢地

---

[1]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65-266。

[2] 葉自成、蔣立群，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黨的文獻（北京）**，第 6 期（2011 年），頁 72。

[3] 楊永明著，**國際關係**，（台北：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頁 24。

[4] 國際體系結構係指體系中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體系，由於美國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展現獨霸的超強地位，較為傾向單極體系狀態，但隨著中國、歐盟與日本等區域大國國地位日漸提升，因此目前多以「單極多元」或「一超多強」概念指涉當前國際體系的權力分分佈情形，參見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位。為了樹立霸權領導的權威與合法性，美國推行以建設國際制度為手段、穩固世界領導地位為目標的全球性制度霸權戰略，並分別從政治、經濟、安全等面向制定和維持由其主導或對其較為有利的行為規則與國際制度，結合其在重要地緣政治領域建立的同盟關係，構築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制度體系。經濟實力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極為重要的物質支撐，國際制度不僅是美國建立霸權與權力擴張的重要基礎，也是美國維護及延續霸權的重要工具。國際經貿暨金融的有序穩定，以及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取得國際社會認同其霸權治理權威的重要基礎。[5]基於國際經濟體系穩定有序攸關美國經濟繁榮和發展的政策評估與認知，美國運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建構以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經濟制度，這套制度不僅成為美國控制和管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也是美國在全球經濟領域建立其制度霸權的主要體現，同時，亦有助於美國將其在全球金融、投資和貿易等領域進行經濟擴張與資源調配的霸權作為予以合理化，並對美國運用控制經濟援助、信用貸款及干預他國經濟政策等手段以限縮他國發展的舉措，提供制度保障的合法性，從而穩固美國在全球經濟的霸權領導地位。[6]

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崛起與國際地位轉變，是影響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現象。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對於參與國際制度傾向抵制、孤立和消極參與的被動立場，對於許多國際制度或規範多抱持否定與排斥的態度，直到鄧小平在 1978 年大力推行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發展目標的改革開放政策後，隨著自身綜合實力增長與對外在環境認知的轉變，中國開始尋求在國際社會爭取與其實力相符的平等地位，[7]並經由加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逐漸融入國際制度；中國一方面學習如何運用國際制度作為反制美國霸權主義的有利工具，另一方面

---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New York: Longman, 2001）, pp. 121-135。

[5]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77。

[6]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84-199。

[7] 資中筠，「百年思想的衝擊與撞擊」，**美國研究(北京)**，第 4 期（1996 年），頁 7-29。

設法在維持既有國際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尋求改革，使其同時兼具國際體系之維護者和改革者的雙重身分。中國認為，現行國際經濟制度長期被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國霸權所宰制和壟斷，存在諸多不公平、不合理現象，例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擁有「一票否決權」的絕對優勢；[8]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對於新興國家信用貸款採取嚴格限制或以經濟改革作為附加條件限縮其經濟發展自主性等情形。為了實現以國內經濟建設為中心、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中國秉持改進與完善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立場，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經濟制度建設，同時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廣大市場與鉅額外匯儲備，[9]陸續主導發起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簡稱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藉以增強國際影響力，進而促使國際經濟制度朝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且對中國較為有利的方向發展。

亞投行是由中國主導設立，用以提供貸款支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之政府間性質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主要扮演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資金援助與融資平臺的角色。[10]亞投行從提出倡議（2013 年 10 月）到正式成立（2015 年 12 月）歷時僅兩年，不僅獲得東協十國、印度、南韓、俄羅斯、英國、德國、法國等區域內、外主要國家的支持，會員國總數亦在 2017 年 6 月由原有的 57 國擴增至 80 國（亞洲域內國家 46 個，域外國家 34 個），[11]整體規模超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8]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對於任何重大決議都要獲得成員國 85%贊成票才能通過，美國分別擁有 16.75%和 15.85%的投票權，等同掌握對該兩個組織各項重大決議的「一票否決權」。

[9] 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美元資產，其主要持有形式是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券，由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管理。2006 年 2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達 8,536.72 億美元（不包括港澳的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截至 2017 年 5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為 3 兆 535.7 億美元，資料來源：參見「中國國家外匯儲備規模」（2017 年 1-5 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網址：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tjsj_lnwhcb。。

[10] 「習近平：真抓實幹主動作為形成合力，確保中央重大經濟決策落地見效」，**新華網**，2015 年 2 月 10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0/c_1114323910.htm.

[11] "AIIB Further Expands Its Membership," *AIIB*, May 13, 2017, accessed May 25,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513_001.html; "AIIB Approves Membership of Argentina, Madagascar and Tonga," *AIIB*, June 16, 2017,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616_003.html.

（61 國）和亞洲開發銀行（67 國），躍升為僅次於世界銀行（189 國）的全球第 2 大多邊開發機構，[12]展現中國具備主導建構區域性、甚或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之實力，致使美國產生被中國挑戰或取而代之的疑慮和不安全感。在美中相對實力此消彼長的發展趨勢下，兩國如何運用國際經濟制度在區域乃至全球進行資源分配與競逐對自身較為有利的戰略地位，以及中國創建亞投行對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可能影響，殊值深入探究，亦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 二、研究目的

全球化趨勢深化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的程度，使國際制度對於促進國際合作、建立國際秩序的影響日益重要。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國際制度，基本上都是由美國霸權體系演化和發展而來，相應使國際制度研究及其理論與美國的制度霸權存在密切的關聯性。本論文以制度霸權概念為經、國際經濟制度為緯，冀能透由國際關係理論架構的分析、歸納和比較，並以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的政經競合作為實證探討，達到下列研究目的：

（一）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創設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目的。

（二）中國深化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

（三）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及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戰略意涵。

##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論文主要探討國際制度和霸權的關係，並以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的衝擊和影響進行實例分析，在文獻回顧部分，筆者認為可從結構現實主義和霸權穩定論等國際關係理論對國際制度的論述、美中官員和學者對兩國參與國際制度評

[12] 據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亞投行成員國至 2017 年底將可能達到 85 個，參見「又 7 國加入亞投行成員增至 77 個」，**中時電子報**，2017 年 5 月 13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513003670-260408「亞投行規模 只輸世銀」，**聯合新聞網**，2017 年 3 月 24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361371.

估與討論，以及亞投行在中國「一帶一路」願景下發展情形與各界對亞投行的看法等層面進行歸納與分析。

## 一、 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制度

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國際制度的定義，主要以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分別提出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最具代表性，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指示行為角色、約制行動及劃定期待的一組持續及互相連接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包括正式的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及非政府國際組織（NGOs）、「國際建制」和國際規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13]克拉斯納將「國際建制」定義為在特定的國際關係領域中，由國家行為者的預期或願望匯集而成的一套明示或默示之原則（principles）、規則（rules）、規範（norms）和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其中原則指的是對事實、因果關係和正直誠實的遵奉信仰；規範則是根據權利和義務所界定的行為標準；規則是用來協調原則和規範之間的可能衝突；決策程序是在制訂和執行集體決定時所採取的普遍作為。[14]此外，王學東主張國際制度可視為國際社會中的博弈規則，是制約國家行為體互動的約束條件；[15]蘇長和亦指出，國際制度就是一系列主要由國家行為者在協調（coordination）環境形成的準則（conventions）和在協作（collaboration）環境創立的規約（contracts）構成；國際制度是規範國家行為者在特定範圍下的一組權利約束，用通俗的說法就是國家行為者間的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16]

綜合上述定義，本論文認為國際制度指涉較為廣義的概念，是可被用來規範國家職責、限制國家行動和影響國家期望的持久且互為聯繫的一組正式或非正

---

[13]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 3-4, 163.

[14]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186.

[15] 王學東，**外交戰略中的聲譽因素研究—冷戰後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解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59-60。

[16] 蘇長和，「重新定義國際制度」，**歐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9 年），頁 22-27。

式的規則，國際制度是參與制度的國際社會成員共同認可和達成的行為準則，[17]不僅是國際體系結構內行為體主觀需求的產物，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的客觀現實，隨著全球化發展趨勢和各國經濟互賴程度日益加深，參與國際制度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衡量各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18]也是各國選擇國際戰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相應提高國際制度在各國對外政策的戰略作用。

有關國際制度的內涵，可運用權力和利益的概念，分別從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和霸權穩定論（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等國際關係理論加以探討，相關學者看法彙整如下：

## （一）結構現實主義觀點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學界通常將其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與結構現實主義等兩大學派。古典現實主義有三大基本假設：國家中心、理性決策及權力至上；結構現實主義（又稱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運用國際體系和權力分配的架構，納入古典現實主義的國家、權力、利益等核心概念，以國際權力的分配狀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19]並提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影響國家行為體國際行為的最主要因素。結構現實主義是古典現實主義的補充、深化和發展，雖然與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權力，但是更強調權力用以達成國家安全與生存目標的工具性，並且認為權力並非國家的最終目標，國家追求權力僅是為了實現生存與安全等目標所使用的手段。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的組成要素，國際結構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自助體系，國家是理性追求利益的自私行為者，受制於國際體系的結構，追求權力是國家基本的行為模式。所謂國際體系結構係指涉國際體系的

---

[17]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150。

[18]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頁 265-266。

[19]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頁 24-25。

權力分配格局，亦即國家依其相對國力在體系中相應位置的排列，國家實力對比是國際體系結構的基礎，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的結構，並以大國間的權力分配為優先。[20]國家之間的權力資源分配，將影響特定議題領域國際制度的存在及性質，尤其是在合作中獲取「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21]結構現實主義的代表性學者華爾茲（Kenneth N. Waltz）認為，國家在國際體系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各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分配情形，才是造成各國對外政策不同的主要原因。[22]此外，國家的權力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來，當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合作時，將會評估和比較對方所獲得的利益是否將改變彼此在國際體系的權力位置。[23]由於國家會考慮無政府狀態的「相對權力」（relative power），[24]因而對國際制度的效率形成制約。[25]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基本上是權力分配的反映。吉爾平（Robert Gilpin）從權力觀點表示，國際制度是霸權主導下的產物，[26]格裏科（Joseph Grieco）主張，國際制度在本質上是國家受到無政府狀態牽引而秉持相對利益的產物，[27]克拉斯納則強調，國際制度是攸關何者利益較能被最大滿足的分配問題，[28]易言之，國際制度是展現權力或實現利益的一種形式。另外，何杰認為，權力的分配結構代表某種權力競爭狀態，它決定國際制度發揮作用的程度，權力決定制度，制度反映權力分配，國際制度是人為設計用來適應權力分配與競爭性合作的制度

---

[20]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頁 40。

[21]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在合作中只關心何者會得到較多的利益，以及是否比他國取得更多的利益；國家最基本之目的在於防止他國在實力上超越及威脅本國的安全，一旦合作關係未能讓本國取得較多、較大的利益，或是他國會因為合作關係取得優勢的地位，合作關係自然消失，參見張亞中，「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臺北：揚智文化，2009 年），頁 23。

[22] 過子庸，**國際關係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2 年），頁 101。

[23] 廖舜右、曹雄源，「現實主義」，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 42-43。

[24] 「相對權力」係指兩國相互對抗的能力比例。

[25]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頁 269。

[26]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39-144.

[27]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alysis with an Amended Prisoner’ s Dilemma Mod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0, No. 3, (1988), pp.600-624

[28] Stephen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1991), p. 336-366.

安排。[29]克勞福德（Robert Clawford）將國際制度視為霸權國維護權力的工具和附屬品，或是內生於國家權力結構的產物。[30]權力愈集中，對國際制度的供應就愈多。克拉斯納以「性別之戰」（Battle of Sexes）博弈模型指出，國際制度經常是權力分配和伴隨利益的關鍵性仲介，其本身也成為權力的源泉，因此並不具備自主性和獨立性。[31]基於權力結構的決定性作用，一旦現有國際制度的權力結構銷蝕，制度將註定崩塌或失去效用。[32]

## （二）霸權穩定論觀點

中文對於霸權的解釋多偏向貶義，孟子首開王霸之辨，主張王道基於仁義、實行仁政，霸道則憑藉武力征服他者；[33]中國社會科學院彙編的《現代漢語詞典》將霸權定義為「在國際關係中以實力操縱或控制別國的行為」，強調霸權是一種地位、能力和權力。[34]霸權的英文"hegemony"源自於希臘語，主要指體系中某個國家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多的權力，居於支配地位，即所謂的霸權國或霸主（hegemon），根據西方人的理解，霸權國或霸主是中性詞，沒有明顯的貶義，意指「有能力確保管理國家關係的原則，並願意這樣做的國家」，[35]而且「能夠控制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規則」，[36]其意涵聚焦於大國的超強地位和對別國的領導與控制。霸權國不是天然存在，也不是被其他國家共同選擇而來，而是基於

---

[29] 何杰，「權力與制度—國際機制理論的現實主義分析」，**歐洲研究（北京）**，第 21 卷第 4 期（2003 年 8 月），頁 31。

[30] Robert Cl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rtmouth: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t, 1996), p. 57.

[31] Stephen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1991), p. 336;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7-9.

[32]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6.

[33]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頁 57。

[34]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21。

[35]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美國註定能領導世界嗎**（*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

[36]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81.

自身對霸權的期望逐漸發展而成，換句話說，霸權是全球國家競爭所造成的自然產物，意指某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領域皆具備絕對優勢的國家實力，並有將其力量轉化為對國際事務、國際體系和其他國際行為體進行干預乃至控制的意願和能力；[37]實力和意願是建立霸權的基本條件；創設用以管理和控制國際事務及國際體系的各種國際制度，同時威脅利誘其他國家參與，是霸權賴以建構霸權體系的手段或方式。此外，經由形塑共同價值觀、信仰、文化和意識型態的過程，建立正當合法的全球治理權威，通常被視為霸權汲於追求的終極目標。[38]霸權的核心是一種國際社會所認可、關涉國家互動關係的制度性安排，[39]國際間的政治與經濟規則大多由霸權所訂定，[40]霸權在國際政治體系獨具的優勢地位，往往與自身在國際經濟體系的優勢地位相輔相成，霸權運用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優勢地位，制定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國際制度與規範，提供包括國際建制、穩定的國際通貨等國際「公共財」（public goods），組建由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並掌控特定時期國際關係的國際制度；[41]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憑藉其雄厚的政經實力，在安全領域建立北約等一系列軍事同盟，並在經濟領域創建以「布列敦森林體系」為核心的世界經濟架構，形成二戰後的國際霸權體系，[42]使美國在各個國際領域同時處於主宰地位，[43]是被國際關係學界公認的當代霸權研究典範。

霸權穩定論旨在解釋霸權結構（hegemonic structure）和霸權結構中行為體的國際行為。吉爾平指出，霸權體系是一種穩衡結構，其主要特點是結構穩定與

---

[37] 門洪華，「國際機制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181。

[38] 門洪華，「國際機制與美國霸權」，**美國研究（北京）**，第 1 期（2001 年），頁 79。

[39] John G. Ikenberry,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pp.43-78.

[40]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6-87.

[41] John G.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p. 375-400.

[4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8-34.

[43]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4, July/August, 2002, accessed May 5,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02-07-01/american-primacy-perspective.

結構內的秩序，霸權國家的實力是確保結構持衡之根本保證。[44]所謂的穩定並非霸權體系的內在和天然因素，而是霸權國家運用軍事和經濟實力維持結構的結果，即霸權國家可以控制或至少影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體系內各個大國都能接受國際秩序現存框架的狀態。霸權國家的地位一旦確立，就會為了其自身利益，盡最大可能減少國際衝突、增強國際合作。[45]霸權國家的利益在穩衡結構中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展現。在國際社會結構中，結構環境對其成員產生限制，此種限制與結構成員的實力成反比，最強大的結構成員受到環境的限制最小，可以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意願。國際政治體系往往是實力最強大的行為者意志和利益的反映，霸權國家對結構的影響程度通常比結構對霸權國家的影響更為強大，並使霸權國家成為霸權體系和國際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由於國際秩序的穩定與霸權國家的利益休戚相關，促使霸權國家竭盡全力維護穩定的國際霸權體系，使霸權穩定成為霸權體系的必然結果，因此，國際社會的穩定程度與霸權國家的實力之間存在一種必然的正相關聯繫。[46]

霸權穩定論的論述多數與世界經濟有關。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主張，世界經濟穩定取決於霸權所扮演的穩定者（stabilizer）角色，霸權的國力與國際政經合作機制具有正向因果關係，渠將經濟學上的「公共財」概念與霸權國家必然形成的關係聯繫起來，並據此提出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家透過制定基本原則、規則、規範和決策程序等舉措，改變次級國家的利益偏好，建立由其主導的霸權體系與國際秩序，霸權國家的實力和威望是次級國家接受國際制度的前提；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只有霸權國家有能力提供國際「公共財」，基於霸權國家擁有絕對權力，促使其願意向體系內的次級國家提供「公共財」，容忍搭便車行為（free riders），使國際體系得以繼續維持及如常運作。[47]霸權穩定論的中心概念強調在國際體系中需要一個主導力量，來驅使、規範及管理體系主要

---

[4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144.
[4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34-35.
[46]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頁 334。
[47]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 86.

成員的互動行為。霸權國家的重要特質是有能力可以建構國際體系的相關機制與法則、具有強烈執行意志，以及承諾推動對體系內主要國家互為有利之事項。[48]保持國際體系穩定的關鍵，取決於霸權國家提供的「公共財」是否滿足次級國家的利益，如果次級國家認為現行國際體系提供的收益大於其所付出的成本，就會選擇支持，反之，則會企圖採取相應作為推翻或改造既有國際制度。[49]換言之，若次級國家不承認霸權國家主導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同時霸權國家所制訂的國際規範牴觸次級國家的核心利益，次級國家將透過權力平衡或直接衝突對霸權國家進行抗衡。[50]

秦亞青和利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皆認為，霸權穩定論是以權力詮釋國際制度的經典理論模式。[51]吉爾平主張，霸權（Hegemony）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地位與角色，透過提供包括國際建制、穩定的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等「公共財」，成為扮演穩定國際政經運作與創建國際制度的角色。[52]陳欣之認為，國際制度由於霸權的存在，呈現出國家間權力不對稱的現象，霸權運用其優勢經濟資源為主的權力，透過創設國際制度來滿足與實現利益，並鞏固其優勢霸權地位，已是國際制度創設過程的重要現象。[53]吉爾平另指出，霸權組建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向全球提供「公共財」，而是符合霸權的利益。[54]例如：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享有製造業的生產力優勢，更擁有掌控全球資本、市場及原料的主導地位，同時透過向其他國家提供這些資源取得影響效果（influence effect），收受美國資源的國家，加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建制，並服從美國

---

[48] 廖舜右、曹雄源，「現實主義」，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 54。
[4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150.
[50] 浦曉宇，「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再思考：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10 年），頁 25-27。
[51] 秦亞青，「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沿革」，**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7 期（2004 年），頁 56-63；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1.
[52]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86-87.；邱坤玄，「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共）美權力關係」，**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2000 年夏季），頁 3。
[53]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政治學報**，第 40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3。
[5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139.

的領導。[55]因此，霸權建立國際制度之首要目的在於符合其利益，而且能夠強化其優勢地位，至於為全球提供「公共財」的舉措，只是建立國際制度形成的外部效應。[56]如果建構國際制度的成本過高，或是霸權本身具有足夠能力採取單方面行動來達成安全與穩定的目標，將大幅降低霸權建立國際制度的可能性。

## 二、美中在國際制度下的競逐

中國經濟崛起已是不爭的客觀事實，並被視為未來可能與美國霸權並駕齊驅的崛起強權，[57]兩國之間的實力消長，相形產生彼此如何適應的問題，吾人可從美中雙方在國際制度下的互動來觀察和理解，相關論點整理如下：

### （三）美國對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評估

中國是否會遵循或挑戰當前由美國主導創設的國際制度，近來成為國關學界關注中國崛起的焦點。伊肯伯里（John G. Ikenberry）從制度和市場經濟的角度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主導構建的國際經濟制度，具備開放性、法制性、規範性及整合性等特質，使得中國等強權在崛起的過程中容易進入卻很難推翻（harder to overturn and easier to join）。即使美中兩國經濟實力對比拉近，甚至有朝一日中國超越美國，中國也不會挑戰美國所構建的國際經濟制度，因為這些制度包含非歧視待遇和促進貿易自由化原則等符合中國利益規範。再者，現有的國際經濟制度係由美國，歐盟、日本及多數已開發國家共同參與和制訂，並獲得多數發展中國家認同，就算美國的實力衰退也不致造成制度的變動，中國若要將其打破或提出替代方案，將必需獲得參與制度的所有國家認可，所要付出的成本過高，也可能面臨被其他國家聯合制衡的潛在風險。[58]奈伊（Joseph S. Nye）和

---

[55]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9.

[56]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頁 123。

[57]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8), p. 24 and 29.

[58] John G.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1 (Jan/Feb 2008), p. 23-37.

貝克利（Michael Beckley）認為，美國是從結構面宰制國際制度和價值體系，其政治體制、文化創意、科技研發等素質都在中國之上，經濟及軍事能力都被過度高估的中國，現階段仍無法挑戰美國所掌控的國際制度。[59]

美國助理防長謝爾（Robert Scher）表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最大受益者，故並無必要打破既定國際秩序，但渠強調中國固然有權爭取若干改變，惟前提是不能逾越國際制度的基本底線。[60]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沙特（Robert Sutter）認為，在未來幾十年裡，維護和平穩定的外在環境、致力自身的現代化發展，將持續是中國最關注的核心利益，中國仍未做好取代美國位置的準備，並認為加入國際制度而不要試圖將之打破或加以修正，有利於增進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若美國的霸權地位迅速衰落，將會引發全球權力動盪的危機，進而損害中國自身的發展前景。[61]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施道安（Andrew Scobell）也提出類似看法指出，對中國而言，遵從國際制度的行為規則並不意味放棄對其國家利益的追求，而是學會如何在新的條件下，以新的方式追求利益，中國的目標是要影響美國等西方國家創立的世界秩序，並非加以破壞。[62]施偉勒（Randall Schweller）則認為，目前中國仍無法提出取代當前國際制度和規範的新藍圖，美國除了對中國採取「棒子與胡蘿蔔」（stick and carrot）策略外，亦可透由對中國和國際社會提出可被共同接受的國際規範，使中國在崛起之後仍會遵循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制度和規範。[63]

---

[59] Joseph S. Nye, "China's Rise Doesn't Mean War," *Foreign Affairs*, Issue 184 (Jan/Feb 2011), p.66;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2-12;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Issue 3 (Winter 2011/12), pp.41-78.

[60] "U.S.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vember 16, 2016,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7,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716.

[61] Robert Sutter, "Why does China Matte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1, Winter 2003/04, p. 88;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年），頁 83-85。

[62]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新北市：左岸文化，2013 年），頁 366、454。

[63]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8; Randall L. Schweller, "Rational Theory for a Bygone Er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Jul/Aug 2011), pp. 460-468.

## （四）中國對參與國際制度的思考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美國對國際制度的宰制是長期存在的現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美國不會放棄既有由其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並會透過這套制度來增益其戰略資源，重構符合美國價值觀的國際制度。[64]楊文靜指出，美國從九〇年代開始，力求把中國拉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企圖藉此影響、改造和約束中國，使中國的行為符合國際規範，但是中國對於國際制度並非單方面、無條件接受，而是根據自身國情和國家利益，在接受國際制度和規範的同時，也設法加以修改、補充和完善，甚至創新。[65]江西元也強調，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全面參與國際制度的改造與創新，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66]浦曉宇則主張，中國接納美國霸權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並非過渡性策略，也不是陽奉陰違，中國實際上是現行國際制度的受益者，國際制度可以被中國作為爭取國家利益的途徑，但中國對現行國際制度仍有不滿意的部分，首先是美國在若干技術層面的措施不盡符合公平原則，其次是美國作為現行國際制度的主導者，有時卻不按照既定的合理規則行事，針對美國作為立規者卻自己違規的情形，中國認為可基於相關國際規範來加以反制。[67]

從歷史發展過程觀察，中國對待國際制度的態度和行為歷經從否定、排斥、反對到接受、參與、融入的巨大變化，[68]並在參與國際制度的過程中，不斷內化、學習國際制度的規則和規範。中國總理李克強強調，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也無意打造新的國際秩序。[69]王緝思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制度霸權不會構成嚴重挑戰，在美國構築的全球霸權體系下，中國仍有相

---

[64]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頁 90-96。
[65] 楊文靜，「中國融入國際機制與美國因素」，頁 144-159。
[66] 江西元，**中國的世界還是世界的中國—中國外交文化本源與國際體系變化趨勢**（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頁 210。
[67] 浦曉宇，「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再思考：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頁 25-27。
[68] 邱坤玄、黃鴻博，「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頁 82。
[69] 「李克強：中國無意挑戰國際秩序」，**FT 中文網**，2015 年 4 月 15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1563?full=y.

當大的崛起空間。[70]陳欣之也認為，中國參與國際制度主要動機是為了獲取依循國際規範的絕對利益，並主張國際制度是崛起強權與現狀霸權權力競合的場域，在組建國際制度的過程中，非霸權國家不僅僅是只能說「不」的反對者與破壞者，相對的，藉由扮演提出具有高度可行性建議方案的談判解套者角色，透過積極的「立」，取代弱國常用的「不」，非霸權國家仍可以在創建新興國際制度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主導的作用。美國並沒有獨佔主導創建國際制度的專利，中國也能透過策略結盟成就國際制度的主導地位，並可藉由操縱議程設定暨外交手段發揮可觀的作用，促成某些國際制度的生成，成為國際制度的催生者與管理者。[71]

## 三、「一帶一路」願景的經濟平臺：亞投行

### （一）「一帶一路」願景

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首次提出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72]2013 年 10 月 3 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於加強與東協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願與東協國家發展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73]此兩項計畫後來統稱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邊及多邊機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74]

---

[70] 王緝思，「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北京）**，第 84 期（2005 年 10 月），頁 13-16。

[71] 陳欣之，「崛起、挑戰與承繼霸權—崛起強權參與建構國際制度過程的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63-88。

[72] 「習近平發表重要演講 籲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華網**，2013 年 9 月 7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7/c_117272280.htm.

[73] 「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新華網**，2013 年 10 月 3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www.xinhuanet.com/world/xjpynghyj/.

[74] 「楊立憲：“一帶一路”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國評論新聞**，2016 年 11 月 23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266&kindid=0&docid=104479757

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計畫，主要是希望利用貿易投資、金融合作等方式，連結東亞、南亞、中東、歐洲及北非地區，發展出歐亞大陸最具潛力的經濟走廊。另外，中國擬訂「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計畫，則是為了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非洲及歐洲沿線國家，共同修建海上運輸與港口基礎設施，增加和沿線國家進行海洋商務往來及經貿合作的機會。「一帶一路」計畫途經的國家，包含亞洲、非洲、歐洲地區約 65 國，合計擁有 44 億人口及 21 兆美金的經濟規模（二者分別佔全球 63%和 29%）、約佔全球 40%的貿易額，未來十年內可望能在基礎建設投資方面帶動 1.6 兆美金的商機。[75]

**圖 1-1　中國「一帶一路」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一帶一路」戰略三年實施的初步成績單」，**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7 年 5 月 12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7 日，網址：http://trad.cn.rfi.fr/中國/20170512-一帶一路戰略三年實施的初步成績單。

[75] 「一帶一路是台灣經濟新藍海」，**中時電子報**，2015 年 4 月 28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8 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8000509-260109。

## （二）亞投行興起背景與相關發展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估算，2010 年至 2020 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總額至少需要 8 兆美元，平均每年投資需求約 8,000 億美元，其中包括新建及修復取代的能源設施 4,088 億美元、通訊設施 1,055 億美元，交通設施 2,466 億美元，以及水暨衛生設施 381 億美元，尤以新建能源電廠及交通設施的資金需求最鉅，分別為 3,176 億美元及 1,762 億美元。在 8 兆美元部分，68%用於新增基礎設施投資，32%是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的資金。[76]目前亞洲開發銀行總資金約 1,600 億美元，世界銀行亦僅 2,230 億美元，該兩家銀行每年能夠提供給亞洲國家與地區的資金僅約 200 億美元，實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

亞投行是由中國主導設立、提供資金支援基礎設施建設的政府間性質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成立宗旨為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並加強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合作，投資項目包括能源、電力、公路、交通、農村電網、農業水利設施等生產性投資。[77]亞投行法定資本 1,000 億美元，中國出資 500 億美元，總部設在北京，行長為中國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理事會主席為中國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中國籌建亞投行之戰略目的是透過為「一帶一路」地區提供融資，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強化地區經貿整合，將周邊國家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提升中國的區域角色及國際影響力。

## （三）各界對亞投行反應與評論

1、官方論述：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亞投行開業儀式致辭表示，亞投行應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相互補充，促進多邊機構共同發展；亞投行應按照多邊銀行模式和原則運作，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經驗和做法，取長補短，

[76] 李瓊莉，「中國大陸周邊外交之政經作為—對外援助」，**中共研究**，第 50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157-163。

[77] 程嘉文，「亞投行是什麼？民眾質疑的問題點是…」，**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 日，版 8。

高起點運作。[78]中國總理李克強則稱，中國願意與各國一起維護現行國際金融體系，亞投行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補充。[79]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原則上不反對亞投行，但強調美國關切亞投行運作透明度和審核放款的規範能否向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看齊。[80]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席茨（Nathan Sheets）表示，若亞投行能達到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同等級的治理與運行標準，並與該等組織合作，將有助於完善國際金融體系，彌補基礎設施資金缺口。[81]美國助理防長謝爾亦稱，中國力推亞投行並依國際規則運作，屬正面發展。[82]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則強調，亞投行是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補充而非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非顛覆，並會建立良好的治理框架，按照多邊機構的規則、國際慣例辦事；[83]亞投行不會是中國的外交工具，但中國也不會迴避在亞投行的大國作用；美國作為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最大股東，都是在這些機構的治理框架下對其發揮影響力，未來中國在亞投行的角色也將遵循此一基本原則。[84]

2、學者看法：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肯恩（Robert Kahn）、「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主席布雷默（Ian Bremmer）等學者指出，中國經濟雖逐年增長，但是在國際貨幣

---

[78] 「亞投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平台」，**人民日報**，2016 年 1 月 17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1/17/nw.D110000renmrb_20160117_2-02.htm.

[79] 「李克強：中國無意挑戰國際秩序」，**FT 中文網**，2015 年 4 月 15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1563?full=y.

[80] 「歐巴馬首提亞投行：未反對各國加入」，**聯合新聞網**，2015 年 4 月 30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6809/872138-

[81] 「美國態度悄然改變，財政部副部長示好亞投行」，**大公網**，2015 年 3 月 29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finance.takungpao.com.hk/dujia/2015-03/2958795.html.

[82] 余東暉，「中俄挑戰現行國際秩序？美助理防長更擔心俄」，**中國評論新聞**，2016 年 11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44/7/3/7/104473711.html?coluid=148&kindid=7550&docid=104473711&mdate=1118063600。

[83] 「金立群：亞投行並非為顛覆而生」，**FT 中文網**，2015 年 3 月 23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1563?full=y.

[84] 「金立群：亞投行非中國外交工具」，**中時電子報**，2016 年 1 月 17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7000928-260309.

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的發言權並沒有相應提升，因此透過倡議設立亞投行表達對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不滿，並希望藉此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致使亞投行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制度構成直接而嚴重的挑戰。[85]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部主任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和彼得森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伯格斯騰（Bred Bergsten）持相反意見認為，亞投行不會對美國的國際地位構成挑戰，美國應該接受中國在亞投行的領導地位，並運用其所掌控的資源和經濟能力來實現兩國的共同目標。[86]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蘭普頓（David Lampton）也提出類似觀點，沈大偉認為，亞投行只是對現行國際制度的補充，並沒有重複或衝突的情形，在全球和亞洲仍有建立功能交互重疊機構的空間，蘭普頓強調，美國的態度將決定亞投行是否將對國際經濟制度形成挑戰的重要因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主張，亞投行是國際體系的後來者，其主要作用在於強化，而不是要推翻現行國際經濟制度。[8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85] Robert Kahn, "A Bank Too Fa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7, 20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www.cfr.org/global-governance/bank-too-far/p36290; Raj M. Desai and James Raymond Vreeland, "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AIIB,"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20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5/04/06/how-to-stop-worrying-and-love-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utm_term=.2b2d67ce4595; Kenneth Rapoza, "With New Bank, China Shows U.S. It's got Soft Power," *Forbes*, March 23, 20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5/03/23/with-new-bank-china-shows-u-s-its-got-soft-power/#1af3cd65d753; 「亞投行是否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美國之音**，2015 年 6 月 15 日，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網址：http://www.voacantonese.com/a/washington-aiib-20150612/2822119.html.

[86] Daniel Blumenthal, "If the U.S. Passed the TPP, the Bank Wouldn't Be an Issue,"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5/04/06/when-us-allies-join-the-china-led-development-bank/if-the-us-passed-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the-bank-wouldnt-be-an-issue; Fred Bergsten, "US should work with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inancial Times*, March 16, 20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4937bbde-c9a8-11e4-a2d9-00144feab7de.

[87] "Should Washington Fear the AIIB?" *Foreign Affairs*, June 11, 20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6-11/should-washington-fear-aiib.

## 四、小結

構成國際制度的三大要素為針對特定問題領域、共同的國際行為模式，以及協調國際關係的一套原則、規範、準則與決策程序。透過規範的建立，國際制度可對國家行為者提供彼此間合作與競爭的規則，強化國家行為者間的政策協調與行為趨同，因而存在以權力為基礎的霸權領導格局，有助強化各國的信任基礎，形塑各國的互動模式，並可發揮制約國家對外行為與創造發展機遇的作用，[88]是解決國際爭端、實現和平穩定的有效手段。[89]

結構現實主義和霸權穩定論分別從權力、利益及公共財等面向，提出對國際制度的觀點，兩者的交集點係國家在國際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形成之結構，與國家在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將制約國家所採取的對外行為，並決定國家行為的結果，基此，有關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和美中關係的影響，本論文認為可從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在國際經濟制度形成的權力分配結構來理解，並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視角進行研究與探討。

#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是指選擇問題及資料的準則，[90]以及決定研究主題的切入點，用以貫穿論文的研究方向。國際關係理論常見的分析層次，主要參照華爾茲在其經典著作《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提出的「個人」（individual）、「國家」（state）、「國際體系」（system）等三個層次。[91]華爾茲認為，影響各國對外政策的因素，並非存在於個人與國家內部，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雖然是最主要的行為者，但每個國家的功能差異性不大，因此，由各國

[88] 王啟明，「國際建制與霸權體系的維繫：以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分析」，**亞太研究通訊**，第 8 期（2010 年 7 月），頁 139。
[89] Stanley Hoffmann, “The Rules of the Gam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7), pp. 41-42.
[90]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0 年），頁 98。
[91]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 Seven Beidges Press, 2000）.

相對權力分配組成的「國際體系」結構，才是影響國家對外行為的獨立變數。[92]「國際體系」層次的概念可區分為「結構」和「在結構中彼此互動的單元」等兩個部分，體系對於單元具有強制的作用，體系結構會決定單元的對外決策，單元必須適應體系；[93]結構單元的行為及其互動造成的結果，必須透由國際體系結構檢視，方能得到確切而完整的理解。[94]

德國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於 2014 年 10 月發表研究報告指出，[95]中國正在以經濟與金融合作為核心，積極主導建立類似現有國際制度的平行結構（parallel structure），並借鏡「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發展經驗和基礎，擘劃「一帶一路」戰略目標。中國推動的平行架構是在既有區域合作平台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安全體系，從週邊國家著手，逐步向全球擴散，藉以抗衡自二戰以來由美國長期主導的全球政經秩序，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由亞投行、「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在經濟領域所組成的平行架構，前者提供資金以協助亞洲國家建設能源、電力、交通、電信、通訊等基礎設施，後兩者則是以實現亞太地區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為目標，並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形成平衡態勢（美「中」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國際制度的平行架構如下頁圖 1-2）。換言之，中國推動建立的平行架構，並不排斥現行國際制度，亦無意挑戰既有國際規範，只是不受美國的束縛，運作方式與現存國際組織亦形成良性競爭或互補關係。中國規劃「一帶一路」戰略，就是想與 APEC 經濟平台對接，並增強與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擺脫美日掣肘；中國創建亞投行的初衷，則是為了改革和完善「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功能。[96]

---

[92] 明居正主編，**國際關係綜論**（臺北：晶典出版社，2010 年），頁 70。
[93] 過子庸，**國際關係概論**，頁 101。
[94] 耿曙、姚源明，「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 156。
[95] Sebastian Heilmann and Moritz Rudolf, “China’ s Shadow Foreign Policy: Parallel Structures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Merics*, No. 18, 28 October, 2014,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www.merics.org/fileadmin/user_upload/downloads/China-Monitor/China_Monitor_No_18_en.pdf.
[96] 「大陸平行架構戰略奏效」，**中時電子報**，2015 年 3 月 31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

本論文採取「結構現實主義」之研究途徑，從「國際體系」層次來探討美中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力分配情形，以及亞投行對現行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所組成國際經濟制度造成的影響，並以相對利益和權力平衡作為分析要素，參照華爾茲提出「國家構成結構，結構造就國家」觀點、金德伯格與吉爾平主張「霸權穩定論」等基本思維，探討中共透過創建亞投行對區域提供公共財，藉以爭取與其政經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之戰略意圖，對於現行由美國宰制的國際經濟制度霸權結構造成的衝擊與效應，以及美國因應亞投行對其歐亞盟邦產生的經濟誘引作用，採取相關對策來維護既有霸權領導地位的戰略因應，藉以歸納美中在國際經濟制度進行權力競逐的結果與對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戰略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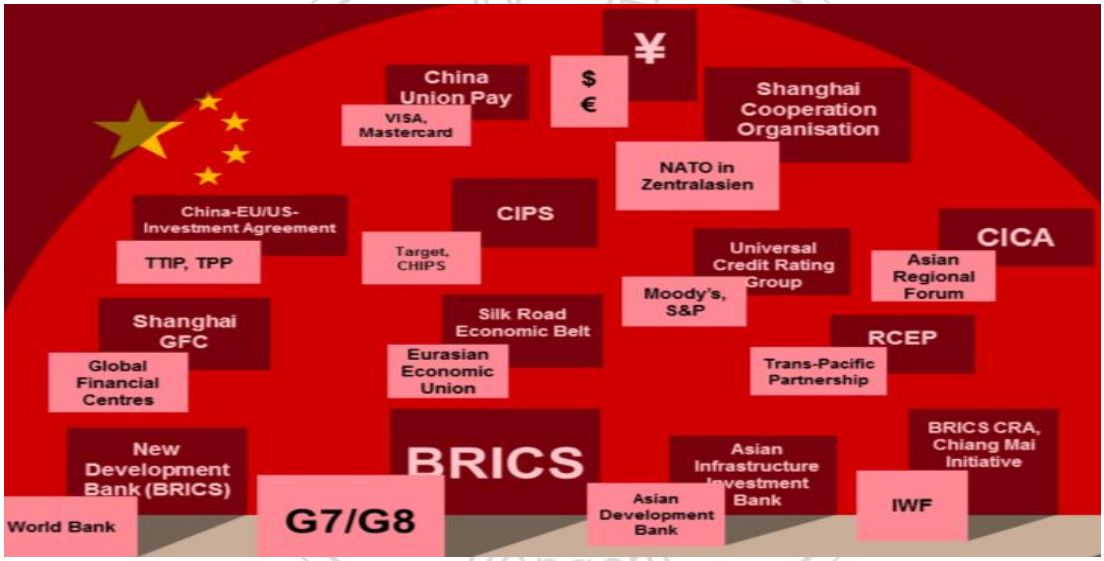


**圖 1-2　美「中」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國際制度的平行架構**

資料來源：“China’s Shadow Foreign Policy: Parallel Structures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Merics*, No. 18, 28 October, 2014.

##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蒐集、處理、鑑定與運用資料的技術，用以協助研究者選擇科學的、合適的研究工具來進行研究。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和「歷史結構分析法」，分述如下：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31002166-260310。

##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依據研究目的和特定主題，整理過往有關研究蒐集文獻資料，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合證明之方式，確認文獻資料可靠性和可信度，作為研究內容的主要來源和分析基礎，其主要目的在瞭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97]文獻分析法在社會科學領域被廣泛運用，也是從事研究工作必須經歷的重要步驟。[98]本論文研究主題為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組成的國際經濟制度和亞投行，資料來源包括美國和中國等政府機關公布的正式官方文件（會議資料、領導人重要講話、白皮書、新聞稿）、國際機構（亞投行、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等官方網站）發表的統計數據（各成員國的認繳股本、份額與投票權設計）和研究報告、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相關研究領域學者專書、重要智庫網站、新聞報導評論，以及圖書館之館藏書籍，並運用整理檢閱、分析歸納及邏輯思考程序，推論美中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互動模式。

## （二）歷史結構分析法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範疇，研究政治經濟經常運用歷史結構分析法，其特點是透由「動態」（縱向的歷史變遷動力）與「靜態」（橫向的結構變化動力）兩種研究面向，交互檢視結構變化顯現的變遷現象與政治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就結構現實主義的論述而言，結構是一套無形的、潛在的限制條件，透過主觀的「社會化歷程」與客觀的「競爭獎懲規則」，制約並且驅迫結構成員的行為。[99]結構雖然對其成員和行為者加諸限制，但也提供創造發展的機會。[100]基此，本論文擬從國際經濟制度的演進、中國與國際經濟制度的互動關係，以及亞投行的發展進程等歷史脈絡，觀察制度結構的制約力量程度，以及主要行

---

[97] 葉至誠、葉立誠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140。
[98]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書局，2004 年），頁 54。
[99] 耿曙、姚源明，「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 156。
[100]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臺北：五南出版社，1995 年），頁 16。

為者（美國和中國）在制度發展的過程中所具有的自主性程度，藉以瞭解和評估美中兩國對外政策是否符合該國的目標與宣佈遵守的規範，並從戰略角度檢視及驗證亞投行對於國際經濟制度發展與美中關係可能產生的衝擊與影響。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聚焦探討中國創建亞投行對當前國際經濟制度的影響，以及亞投行對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戰略意涵，並將研究範圍區分時間、議題領域、「中國」與「中共」的概念界定，說明如后：

#### （一）時間界定

本論文以亞投行為研究主體，同時選擇性質相近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輔助探討美中兩國如何運用國際經濟制度進行權力和利益的戰略競逐。由於亞投行從 2013 年提出倡議到 2015 年成立運作迄今的發展時間較為短暫，因此將時間範圍回溯自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伊始，探討美國主導創設國際經濟制度的演進、功能與戰略作用，並檢視中國 1978 年施行改革開放政策前後，歷任領導人對參與國際制度的態度、立場與角色等轉換過程，輔以此期間美國在中國政策的主要變化進行綜合分析，藉以增加研究之完整性。

#### （二）議題領域界定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遂行全球性制度霸權戰略，相繼從政治、安全、經濟等層面主導創設聯合國、北大西洋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諸多國際制度。本論文重點係對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的政經分析，研究領域聚焦國際經濟制度下的亞投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並將制度

霸權作為核心議題，針對國際關係理論、東西方學者看法、媒體報導評論等進行資料蒐整與歸納研究內容，以強化本論文的概念架構。

### （三）「中國」與「中共」概念界定

自 1949 年兩岸分治以來，中華民國和中共政府對於「一個中國」主張一直存有歧見，本論文所指稱之「中國」，帶有從國際層次切入的意涵，亦即「中國」是國際體系中的主權國家和獨立行為者，目前係由中共政府代表「中國」在國際間行使外交行為，是以本論文援引中共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表述來進行「中國」與亞投行之分析與研究，亦無涉筆者的個別政治立場。

##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說明如下：

（一）亞投行是一個正在發展且成立運作時間較為短暫的國際金融組織，在具體發展歷史和統計數據等資料的蒐整有其侷限性，此係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限制，因此僅能透過探討和比較亞投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的功能、背景和發展，從中推論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與美中關係的影響。

（二）本論文著重探討美中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力互動情形，並以亞投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的組織架構、投票權設計、援貸條件為分析指標，亦僅將相關國家爭取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之目的納入考量，排除對制度內其他成員國的研究或潛在變數。

#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一、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架構係源自對亞投行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相互適應與衝突關係的思考，並試圖從「權力」、「利益」、「霸權」三面向，探討在美國主導構建的國際經濟制度下，中國伴隨自身政經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提昇，對於國際經濟

制度從排斥、參與、融入，到試圖透過創建亞投行尋求改善其在國際經濟制度的不利地位等轉變過程，從中推論美中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之權力消長情形，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影響與戰略意涵。

##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依序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與探討、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二章整理國際經濟制度的演進、功能與戰略作用，並從美國構建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構想和中國運用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意圖等面向，分析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下的戰略互動，探討國際經濟制度對美中關係的影響；第三章針對中國創建亞投行的背景與動機、亞投行發展現況、美國採取的因應對策，以及亞投行未來可能面臨之風險與挑戰進行歸納與整理；第四章聚焦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競合關係，透過探討及比較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的組織結構、投票權設計、援貸條件異同，推論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和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戰略意涵；第五章為結語，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發現與未來展望。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二章　美中在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互動

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往往著重討論與分析軍事衝突、權力競爭或國家安全等等現實主義強調的「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而忽略經濟貿易、貨幣金融或社會文化等「低階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隨著國際間相互依賴與影響程度的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進行，不論在理論面或是實務面，「低階政治」的國際經濟議題，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有時甚至會影響或形塑「高階政治」的發展，[1]對於各國的外交政策的影響和戰略作用也不斷提高。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其強大的國家實力為基礎、國際制度為側翼，建構全球性制度霸權體系，並且運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組建國際經濟制度主導世界經濟發展，維護其經濟霸權地位，使美國成為霸權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採取積極姿態參與和融入國際體系，期間歷經了從旁觀者、反對者到積極的參與者和改造者之身分認同與轉換過程，[2]對於地區和世界事務越來越能夠發揮影響力，使其具有偏好目前國際體系和對世界秩序抱持修正主義的雙重角色與作用。[3]自 1990 年代中期以降，中國陸續提出了「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中國方案、中國主張」等一系列強調維護中國政治制度與價值觀的「中國中心主義」之國家定位和外交主張，日漸展露其伴隨經濟實力強勢崛起的大國自信，並以推動現有國際經濟制度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作為反制美國經濟霸權的戰略工具，凸顯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的意圖和政策傾向，加深美國對中國崛起是否會挑戰現有國際政經制度的關切與疑慮。本章將從二次世界大戰前

---

[1] 李明峻、林正順編著，**國際關係與現勢**（新北市：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7 年），頁 41。

[2] 阮宗澤，**中國崛起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轉型－共有利益的塑造與拓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5。

[3] Yong Deng, “Remold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o. 4-5 (2007), p. 882.

後的國際經濟制度之演進和美中兩國對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進行探討，從中推論國際經濟制度對美中關係發展的影響與意涵。

## 第一節　國際經濟制度之演進與戰略作用

國際經濟制度是指在某一時期內，國際行為主體以國際經濟關係為基礎，所所形成在國家之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力量對比關係或權力均衡狀態。[4]也就是各國針對特定經濟領域事務所制訂用以調節國家關係的程序、規則和組織制度的總稱。[5]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與深化，經濟實力對構成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國際間的政治較量常以經濟競爭形態展現，各國往往透過國家經濟力量的增長進行政治角力與權力競逐，使國際經濟制度的制定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國際強權政治因素所左右，並經常被視為是霸權國家用以主導和維持國際體系穩定所提供的「公共財」，以及合法控制和管理其霸權勢力範圍與謀求利益的工具。[6]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運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建構「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國際貿易與金融領域形成國際性的制度安排，並確立戰後維繫國際經濟運作的重要架構與基本規範，對於穩定世界經濟發揮重要的引導作用，被國際關係學界視為是觀察國際經濟制度發展的重要階段，[7]以及研究國際經濟制度和美國經濟霸權的最佳典範。

### 一、 國際經濟制度之演進

國際經濟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複雜漸進的歷史過程，可經由檢視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作為理解國際經濟制度演進的基礎和出發點。根據不同時期的國際環境和決定因素，以二次世界大戰為時間分界，國際經濟制度之演進大致可

[4] 劉笑瑜，「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過程及決定因素」，**當代經濟（北京）**，第 17 期（2011 年 9 月），頁 66-67。
[5] 王杰主編，**國際機制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頁 303。
[6] 張敬新、蘇俊燮，「國際制度的霸權」，**國際觀察（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19-24。
[7] 李世安，「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特里芬難題』」，**世界歷史（北京）**，第 6 期（2009 年），頁 4-15。

區分為「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和「布列敦森林體系」等兩個時期，茲分述如下：

## （一）「金本位制度」時期

早期進行國際貿易主要是以黃金等貴重金屬作為交易貨幣，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展及通訊基礎設施的建設，跨國界金融流通愈來愈緊密，一套以黃金為計價標準的貨幣兌換制度在 1870 年代於焉成形，通稱為「金本位制度」，各國通貨皆可經由該制度兌換為一定數量的黃金，據以作為不同貨幣相互兌換的標準。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國政府以本國通貨訂定黃金官方價格，通稱為匯兌的鑄幣平價，因此建立通貨與黃金之間的可兌換性，為了維持匯兌的鑄幣平價或是黃金與本國通貨之間的兌換率，各國政府必須依據本國黃金準備數量調整貨幣存量，透過「金本位制度」，即各國通貨與黃金之間的兌換性，因而形成國際匯率制度。由於「金本位制」與所有採用該制度之國家間的匯率制度相互連結，使得黃金與各國通貨間的兌換率間接構成國家通貨之間的匯率。[8]

英國自工業革命後，國勢強大，經濟力量豐厚，擁有眾多海外殖民地，使其雄踞世界貿易的支配地位，倫敦成為當時世界貨幣與資本市場的中心，以英鎊為中心的「金本位制度」則係維持當時國際金融秩序最重要的國際經濟制度。[9]在「金本位制度」之下，黃金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資產，英鎊是國際匯兌的關鍵通貨，直到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英國的國際收支保持順差，資金實力雄厚，黃金儲備充足，致力於促進單一且開放的全球貿易市場，相應形成由英國掌控的經濟霸權體系，並對海外殖民地及其附屬國進行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

一次世界大戰時，大部分國家禁止黃金輸出和買賣，金本位的運作機能因而停頓，造成「金本位制度」的中斷，各國為維護本國利益，逐漸形成英鎊、美元、

---

[8] Barry Eichengreen & Marc Flandreau ed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ory and History 2nd* (London: Routledge, 1997)，轉引自楊永明著，**國際關係**，頁 319。

[9] 江啟臣，「國際貿易與金融」，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 308。

法郎等三個貨幣集團，國際金融因此陷入一片混亂。戰後，因為各國將英鎊大量兌換成黃金，英國逐漸失去在國際貿易與金融的主導地位，美國則因戰爭財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與資本輸出國，同時也是與歐洲列強並駕其驅的世界政治大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高。從 1925 年開始，儘管英美兩國試圖協力引導國際經濟重返「金本位制度」，但是紐約股市在 1929 年秋天崩盤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經濟恐慌氛圍由此向國際蔓延，加上歐洲政治衝突日益嚴重，在充滿不確定性與恐懼氣氛下，使英國被迫在 1931 年 9 月宣布終止黃金兌換，「金本位制度」宣告結束。其後，為了解決國際金融關係在「金本位制度」崩解後的混亂狀態，英、美、法三國於 1936 年簽署《三方貨幣穩定協議》（Tripartite Agreement of 1936），該《協議》是奠定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強勢地位的重要基礎，亦有學者稱之為「布列敦森林體系」的雛型。[10]

## （二）「布列敦森林體系」時期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憑藉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優勢迅速取代英國，並成為國際經濟制度的主導者，美元也順勢取代英鎊成為戰後的國際主要貨幣。為了解決 1930 年代國際貿易與金融失序狀態，消弭貿易壁壘，穩定金融及避免衝突再起，1944 年 7 月，美、蘇、英、中、法等 44 個盟國各派代表在美國新罕布夏（New Hampshire）州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市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建立國際貨幣與金融交易標準及戰後重建問題，此即所謂的「布列敦森林會議」。美國身為當時世界主要的經濟暨軍事強權，幾乎完全主導整個會議進行與結論，並強烈主張美元與美國經濟應在戰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全球經濟應朝貿易自由化、市場開放與金融穩定的方向邁進。在美國的主導下，與會國家最終決議通過《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最後決議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兩個附件，這些文件總稱為「布列敦森林協定」。1945 年

[10] 楊飛，「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演進歷程及其啟示」，**現代經濟信息（黑龍江）**，第 13 期（2010 年），頁 151。

12 月 27 日，「布列敦森林協定」生效，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前身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宣告成立，通稱為「布列敦森林體系」，主要功能係執行戰後的重建與發展計畫，並維持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是「布列敦森林體系」的核心內容，此兩機構設立方式、組織結構和決策程序基本相同，皆由會員國根據各自的國民生產總值、對外貿易額、黃金和美元儲備等重要指標認繳的基金份額所組成，同時採用股份制企業的運作模式，以理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由執行董事和總裁組成執行董事會處理日常事務，決策程序則以多數決的形式進行（一般事務由簡單多數決定，重大事務和特別重大事務分別由 80%和 85%的絕對多數票決定），各會員國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根據其投票權決定，而投票權基本上等於各自繳納的基金份額。由於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成立初始所認繳的基金份額最多，分別擁有 27%和 23.81%的投票權，許多重大議題必須美國同意才能通過，使美國實質上掌握了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權，並據此確立美國在國際經濟領域的霸權地位。[11]

「布列敦森林體系」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所謂的「雙掛勾」規定，即美元以 35 美元兌 1 盎司黃金的固定比價與黃金掛鉤，美國政府承諾按照此一黃金官價隨時用黃金兌換其他會員國政府擁有的美元，其他會員國的貨幣主要根據各自的含金量，以不同的固定比價與美元掛鉤，上下波動不可超過 1%，這些國家的政府有義務協助維持 35 美元兌 1 盎司的黃金官價和各自貨幣與美元比價的穩定，不可輕易調整匯率；若匯價變動逾 10%，必須獲得 80%以上投票權同意。這項特殊規定賦予美元代表黃金成為唯一世界貨幣的特殊地位，以及做為世界性的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和黃金之外的唯一國際儲備貨幣，並具備國際流通、計價、結算、儲備等功能，形成二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金匯兌本位制度和國際

[11] 何嵐，「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美國霸權」，**揚州教育學報（江蘇）**，第 22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39-44。

固定匯率體系。[12]由於美元成為國際外匯市場的交易貨幣，以及各國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的主要貨幣，相應使「布列敦森林體系」形成以美元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亦被普遍視作美國財政部的代理機構。[13]1971 年 8 月，由於當時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導致黃金大量外流，黃金儲備大幅減少，無法支撐 35 美元兌 1 盎司黃金的固定匯率，並持續貶值；到了 1973 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政府單方面宣佈停止以黃金兌換別國政府持有的美元，造成美元的國際信用深受打擊，歐洲及其他主要國家紛紛退出固定匯率制，致使固定匯率制徹底瓦解，各國因此在 1979 年通過「牙買加協議」，改採「以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化國際儲備與浮動匯率」之貨幣體系，「布列敦森林體系」自此正式結束。[14]

「布列敦森林體系」是二戰後國際政治力量對比變化的產物，象徵美國在二戰以後正式確立其全球經濟霸權的領導地位，奠定以美元為中心、以美國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美國價值觀為準則的國際經濟制度。[15]不僅是世界經濟史上史無前例的制度創新，並在國際匯率安排、儲備貨幣形式及收支調節方式都留下美國霸權的痕跡。[16]美國主導建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致力於穩定匯率，促進多邊貿易關係，重建二戰後全球經濟與幫助窮國恢復發展，[17]並將美元與黃金保持固定匯率，世界各國的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此不僅在貨幣金融領域實現美元霸權，亦使美國可透過對外大量信貸和投資，影響他國經濟的運作及控制其經濟資源，確立了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布列敦森林體系」雖然已在 1970 年代被浮動匯率制度取而代之，但其所形成對國際體系主要大國較為有利的制度規則並未發生根本變化，美元仍是國際金融體系難以替代的基礎貨幣，美國在國際貨幣基

---

[12] 鄭保國，**美國霸權探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年），頁 398-400。

[13] 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著，任曉、張耀、薛晨譯，**帝國的悲哀：黷武主義、保密與共和國的終結**（**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10。

[14] 過子庸，**國際關係概論**，頁 261。

[15] 門洪華，「美國霸權與國際秩序：一項歷史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頁 37-73。

[16] 柳劍平，**當代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204。

[17]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頁 188。

金和世界銀行始終握有「一票否決權」的主導性影響力，該兩機構迄今對當代全球經濟發展仍然發揮著制度性的框架作用。

## 二、 國際經濟制度之功能

國際經濟制度可按照其職能區分為國際貿易協調機制、投資信貸協調機制、匯率協調機制、針對國家內部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以及對前述各種機制的監督保障機制。各類機制都包含許多具體且不同層次的內容，且在個別專門領域都有一個或數個特定的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組織或機構來擔負其職能。[18]以構成「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為例，國際貨幣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向國際收支逆差的會員國提供貸款等融資援助，以穩定該國貨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並協調與監督各國貨幣政策，調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從而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原名「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世界銀行，在 1948 年以前的功能是以戰後歐洲地區重建為主要階段性目標；1948 年以後，則是以向較落後的會員國提供長期低息的優惠貸款，用於發展農業、水利和交通等基礎設施來協助經濟發展，以及改善落後地區人民生活水準等為其主要功能。簡言之，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功能雖有不同，但都共同為全球經濟穩定與發展發揮作用。

由前段「布列敦森林體系」例證顯示，國際經濟制度具有幫助各國達成協議，並對於已達成之協議提供保證等效用，其功能可區分為聯繫、調控、資源配置、利益分配及監督等 5 項，分述如下：

### （一）「聯繫」功能

經濟全球化與殖民主義擴張促使各種商品、資本、技術、勞力在各國之間相互流通，形成彼此影響和制約的世界體系。囿於各國經濟發展水準與現實條件等限制，幾乎沒有單一國家可自行生產和製造該國需要的全部產品，國家之間基於供需關係，建立基礎工業成品和初級產品的固定流通模式，並透由國際經濟制度

[18] 王杰，**國際機制論**，頁 310。

來維持穩定、有序的國際市場，同時共同應對在經濟發展過程可能遭遇的潛在風險。

**（二）「調節」功能**

對於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和不均衡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態，僅依賴市場機制自行調節往往較缺乏效率，經由國際經濟制度進行調節之目的是使全球經濟可朝各國共同期待的方向發展，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減少摩擦和不必要的損失，並可維持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此外，國際經濟制度對全球經濟進行調節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亦會受到各國相互聯繫的緊密程度及國際政經局勢的發展所影響。

**（三）「資源配置」功能**

世界各國的國力發展程度和專業分工雖有不同，但在經濟方面都擁有各自的比較優勢。運用國際經濟制度作為調控資源的手段和途徑，有助於改善全球資源配置分布不均的狀態，使各國獲得的利益趨於平衡，並將相對過剩的資源調配至最需要的國家或地區，藉以增加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投入總量，從而提高生產率及促進全球經濟增長。

**（四）「利益分配」功能**

除了市場運作自發形成利益分配之外，國際經濟的利益分配主要受到貿易、匯率、投資及人員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各國政府也會透過頒布政策或法令來調整該國的利益得失。建立國際經濟制度可使各國的對外行為受到約束，並減少各國在經濟活動的利益衝突和交易成本，當國家受到不可預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響而遭受損失時，也能夠從國際經濟機制獲得補償。簡言之，國際經濟機制有助創造互利的國際環境，使各國在互利的基礎上實現利益分配。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五）「監督」功能

國際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維持，反映了國際社會在經濟領域達成的共識，藉以確保相關協議的達成與執行，擴展各國在經濟領域的決策空間，減少各國對於不確定性的疑慮，促進正常國際交往。此外，國際經濟制度亦建立明確的利益制約、經濟制裁等監督和懲罰機制，使國際合作能夠正常開展和順利進行。[19]

## 三、 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作用

所謂戰略係指分配、使用和發展國家權力以達到國家目標的科學及藝術，[20]泛指針對全局性、高層次等重大議題，在對抗和競爭中謀取利益之籌劃和指導。戰略包含「目的」（ends）、「方式」（ways，又稱為構想）、「手段」（means）等三項基本要素，「目的」指所欲達成的目標；「方式」為行動過程形成的概念；「手段」則係達成目標所需的資源與使用的軍事與非軍事工具。[21]霸權戰略通常有兩種實現方式，一種係採取強制的治理手段，憑藉經濟、軍事實力建立和維繫霸權國家的支配體系，是為「權勢霸權」；另一種是運用掌握物質資源的優勢，以利益為紐帶，藉由對其他國家提供「公共財」來維繫霸權國家的主導地位，也就是採用創設制度的方式來保持霸權，又稱為「制度霸權」。霸權國家憑藉物質資源為主的實力與優勢，制定和維持由其主導或對其較為有利的國際制度，形塑霸權治理權威的正當性，來滿足與實現其利益，從而建立霸權體系和鞏固其霸權地位，因此，國際制度不僅是權力競逐與利益安排的產物，也是國家權力和地位的表徵，並具備實現霸權戰略的工具性作用。學者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即認為，霸權國家可以運用創建國際制度，以及自我克制使用優勢的權力，更有效

---

[19] 王杰，**國際機制論**，頁 311-315。
[20] 鈕先鍾，**國家戰略論叢**（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頁 33。
[21] Arthur F. and Lykke Junior, Jr., “Toward a Understanding of Military Strategy”, in Joseph R. Cerami and James F. Holcomb, Jr., eds., *U.S. Army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1), p. 179.

的控制全球其他國家，並且創造一個被全球大部分國家所接受，同時有利於霸權國家主宰的國際秩序。[22]

國際經濟制度的形成與霸權國家的利益和戰略需要密切相關，霸權國家可以透過建立國際經濟制度，協調國家利益和限制國際行為，發揮權威性、制約性和合法性等戰略作用。從「布列敦森林體系」觀察，在權威性及制約性方面，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擁有強大的金融實力與生產能力，具備霸權領導條件，基於當時戰後重建及經濟復甦等現實需求，美國以「公共財」形式主導創建「布列敦森林體系」，在國際經濟領域建立被各國所認同的行為準則與規範，藉以引導成員國在「布列敦森林體系」制度框架內定義和實現國家利益，並對成員國之國際行為產生相當程度的制約作用，同時發揮權威性的影響力，「布列敦森林體系」遂成為美國用以控制和管理其經濟霸權範圍，以及維護權力優勢的重要工具。在合法性部分，「布列敦森林體系」是在美國強勢主導下，促使參與「布列敦森林會議」國家決議通過的國際經濟制度，「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章程和規範體現了與會國家之共識、有關各方接受且同意遵循的責任和義務，因而賦予其所形成之國際經濟制度必要的合法性。換言之，「權力的獲取和運作必須與所確立的規則相互適應」，[23]國際經濟制度的制定和遵守，係由霸權國家或體系內主要大國所主導，藉由協調多數參與國家利益與規範成員國行為的制度設計，獲得全體國家一致同意或認可，構成了國際經濟制度權威性和制約性的根本來源，並據以做為國際經濟制度取得合法性的基礎條件。霸權國家或體系大國的國力愈強盛，國際經濟制度規則得以貫徹實施的力度愈大，影響範圍也愈廣泛，國際經濟秩序將愈趨於穩定。

[22] 陳欣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 32。
[23] David Beetham, *The Legatimation of Power*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p. 64.

## 第二節　美國創設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構想

國際制度包括各國權力分配、利益分享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規範，幾乎涉及國際關係的各個領域，是當代主要國家規劃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礎。透過國際制度來主導國際事務是美國霸權的顯著特徵，經濟實力則是美國霸權最核心、最穩定的根源。[24]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全面介入國際事務，但是並未明顯採取歷史上霸權國家常用的武力征服和殖民統治等權勢霸權手段，而是運用強大的經濟實力，將其轉化為政治上的支配權力，填補英國霸權崩潰造成的權力真空，藉由主導安排各個領域的國際制度，並以相對和平及隱蔽的間接路線建立和維護自身在全球的霸權領導地位，力圖將全球納入美國規劃的國際制度體系，制度霸權因而成為美國建立和維持霸權地位的主要方式。

### 一、 國際制度是美國建立霸權的戰略工具

國際制度是國家行為體在特定領域透過協調一致，為達成某種目的而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及機制，也是建立和維護霸權的重要戰略途徑。當前國際制度的本質是「以美國為中心、以符合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為原則、以西方資本主義價值標準為準繩」。[25]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為了確保全球治理的優勢地位，在建構國際秩序的過程中一直扮演主導角色，並全面掌控國際秩序的定義權。[26]建立霸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美國運用優勢的實力地位和豐厚的物質資源，從政治、經濟、安全等面向制定和維持由其主導或對其較為有利的行為規則與國際制度，結合其在重要地緣政治領域建立的同盟關係，構築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制度體系，將強大的結構權力深嵌進國際秩序之中，[27]樹立霸權領導的權威

---

[24] John G.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1 (2001), p.191-212.

[25]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8 年），頁 484。

[26] 鄭永年，「如何應對美國的國際秩序定義權？」，**灼見名家**，2015 年 12 月 24 日，檢閱日期：2016 年 5 月 8 日，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6106?nopaging=1

[27] 張勝軍，「全球結構衝突與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危機－解讀伊拉克戰爭後的世界政治」，**美國研究（北京）**，第 3 期（2003 年），頁 30-41。

與合法性，縮減維護全球霸權地位的戰略成本。在國際制度的框架中，由於各國的實力不同，彼此間的地位並不平等，大國往往擁有較多的決定權，使美國得以利用此一不平衡狀態，在協調大國利益的基礎上建立國際制度，並誘迫弱小國家在表面上以「搭便車」的形式，接受大國較佔優勢的國際規範與美國的霸權領導。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全球性國際制度建設奠定了現今國際格局的基本框架，成為美國霸權的一種國際保障。[28]推展國際制度需要實力維持、利益支撐和大國協調合作，美國霸權和其主導創建的國際制度存在相輔相成的戰略關係。歷史上的霸權都是以軍事實力為基礎，並採取強制手段實現其海外利益，美國與過往霸權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完全依靠軍事實力，而是企圖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制度霸權體系。[29]美國霸權實質上是一種制度霸權，所謂制度霸權，就是以硬實力和優勢物質資源為基礎，透過制定、維持和實施國際制度來鞏固霸權體系，並藉此合法、有效領導體系內的其他國家，獲得較多國家的政治支持，減少霸權政策對武力的過分依賴。[30]美國的國際戰略目標是維護並且強化其全球超強地位，確保美國宰制與領導的國際體系，得以恆常維持符合美國利益與價值標準的穩定狀態，[31]開放且可進入的國際制度是美國霸權被廣泛接受的主要因素。[32]國際制度係美國建立霸權與擴張權力的重要基礎，也是美國維護及延續霸權的有力支撐；由於國際制度為美國霸權提供便利的權力資源，亦使國際制度成為美國確立全球霸權的戰略工具，堪稱美國的「霸權之翼」。[33]此外，因為美國在設立、調整和

---

[28] John G.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86-287.

[29]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3。

[30] 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84。

[31] Yang Jiemian, "China and U.S.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Carola McGiffer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6）, p.13.

[32]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 1-13; John G. Ikenberry,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1999), pp.43-78.;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33]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頁 303-304。

改造國際制度等方面享有較多主導權和選擇權，相應使得國際制度與美國霸權的建立、維持、衰落乃至重建存在直接的關聯性。

## 二、美國運用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布局

美國是當今國際制度的主導者和主要制定者，[34]多數現有的國際制度是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時建立的。[35]美國的經濟實力在 19 世紀末超過英、德等歐洲大國躍居世界首位，二戰期間美國更大幅加強相對於其他經濟大國的優勢地位，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估算，美國工業總產出在 1939-1944 年間增長 77%，平均每年增長 12%。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 65%，對外貿易額佔約 1/3，黃金儲備約佔 75%，[36]工業產值則約佔全球總量的 48%，[37]並在生產效率、工業製造、商業能力、金融貿易等方面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美國霸權首先是在經濟領域建立起來。[38]經濟實力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極為重要的物質支撐，國際經貿暨金融的有序穩定，以及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取得國際社會認同其霸權治理權威的基本要件。[39]基於國際經濟體系穩定攸關美國經濟繁榮和金融發展的政策評估與認知，美國運用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基本原則、規則、規範和決策程序，建構以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經濟制度用以維護其經濟利益，這套制度反映著美國式的政治結構及組織原則，使美國得以按照其國內認可的系統規則，主導制定其他國家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從而提供「庇護式領導」（paternal leadership），[40]藉以影響其他國家對利益的判定與追求方式，形塑各國處理國際

---

[34] 王杰主編，**國際機制論**，頁 125。
[35]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 mill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50.
[36] 王緝思等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頁 164。
[37] John G.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4 (Fall 1989), pp. 375-400.
[38]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6-87.
[39]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頁 77。
[40] Klans Knor, *The Power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25.

問題的方案。對其他國際行為體來說，國際經濟制度不僅是美國霸權領導下提供的「公共財」，也是它們所需求的物資，因為國際經濟制度可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並且係在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創立責任和義務之指導原則，故而在某些程度上符合各國的期望，違背制度規範不但有損彼此獲益的制度安排，也將損害違反者的聲譽及其未來參與制定協議的能力，可以發揮規範各國對外行為的制約作用，致使國際經濟制度在美國經濟霸權體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由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構成的國際經濟制度不僅確立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優勢地位，亦使美國可透由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分別擁有 16.75%和 15.85%的「一票否決權」，[41]充分掌握對該兩機構重要議程設定的操控權，並將美國所處的支配地位和其他成員國所處的不平等地位加以正當化，從而接受在「不對稱相互依存」現實下，不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關係；簡言之，美國主導創設的國際經濟制度，不僅成為美國控制和管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也是美國在全球經濟領域建立制度霸權的主要體現，同時，國際經濟制度亦使美國可將其在全球金融、投資和貿易等領域進行經濟擴張與資源調配的霸權作為予以合理化，並對美國運用控制經濟援助、信用貸款及干預他國經濟政策等手段用以限縮他國發展的舉措，提供制度保障的合法性，從而穩固美國在全球經濟的霸權領導地位。[42]

## 第三節　中國運用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

從結構現實主義角度觀察，參與國際制度是實現國內經濟發展目標的手段。國際制度是國家之間交往的制度化安排和共同行為準則。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從 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體系的改造者」（system transforming），到 20 世紀 70 年代「體系的改革者」（system reforming），再到 20 世紀 80 年代「體

[41]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對於任何重大決議都要獲得成員國 85%贊成票才能通過，美國分別擁有 16.75%和 15.85%的投票權，等同掌握對該兩個組織各項重大決議的「一票否決權」。
[42]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頁 184-199。

系的維持者」（system maintaining）之調整，[43]歷經了從旁觀到融入、從消極到積極、從邊緣到中心的波折與過程，[44]尤其改革開放導引中國的外交路線從革命浪漫主義到經濟實用主義轉變等歷程，隨著國家實力增強、國際戰略地位提升，以及外交理念與時俱進，奠定了中國參與建構國際制度的基礎，中國在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日益重視國際制度作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性作用，使國際制度逐漸成為中國實施外交戰略的重要途徑，同時，透過積極參與和制定國際經濟規則，維護自身在國際經濟制度框架下的國家利益，進而增強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亦已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的重要戰略目標。

## 一、 中國在國際制度的定位與角色演變

中共在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發展目標，強調「二十一世紀前 20 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45]所謂戰略機遇期，是指某一具有戰略意義的發展機會、環境和空間可能持續的時間跨度，或是能夠容許某一戰略實施的客觀環境及其持續的時間跨度。據此解讀二十一世紀前 20 年的戰略機遇期，其內涵係指在未來 20 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將可以有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可以集中主要精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此一戰略機遇期的基本特點是，主要大國的國際戰略、實力對比及其相互關係處在相對平穩的調整過程，彼此之間雖然有矛盾和利益衝突，但是不致演化為足以改變中國國際環境的對抗性軍事衝突；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世界多極化格局仍處在逐步形成的過程，短期內還不會形成對中國發展不利的單極體系；霸權主義及其他對中國不利或不確定的因素，亦不致於在短期內整合

---

[43] Samuel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Oksenberg Michel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pp. 45-46.

[44] 蒲俜，「中國和平發展構建國濟制度的途徑分析」，**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5 期（2016 年），頁 75-81。

[45]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9。

為矛頭集中指向中國的整體力量和戰略態勢。[46]因此，中國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47]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對掌控國際話語權傾向採取被動防守立場，對於許多國際制度或規範多抱持否定與排斥的態度，基本上是游離於國際制度之外。直到 1978 年鄧小平大力推行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發展目標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隨著自身綜合實力增長與對外在環境認知的轉變，使中國對外交往的姿態開始從天朝上國的自我定位，轉變為爭取與其實力相符的平等地位，[48]並經由加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逐漸融入國際制度；中國一方面學習如何運用國際制度作為反制美國霸權主義的有利工具，另一方面設法在維持既有國際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尋求改革，使其同時兼具國際體系之維護者和改革者的雙重身分，並開始由「體系參與者」向「集體領導者」的角色過渡，全面積極參與國際制度的改造與創新，善用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推動大陸整體發展，為中國拓展國家利益尋求更為廣闊的外交戰略空間，儼然成為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並在全面開放的基礎上，將有限的外交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逐步形成「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外交戰略布局，藉以維持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和多邊外交關係的動態平衡。[49]

## 二、 中國對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運用

國際戰略是國家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針對國際關係長期性、全局性發展的理解，據以制定的目標和行動方針。[50]鄧小平在評價和論述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戰略時，多次使用國際戰略的概念，並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戰略策略的基本原理與當代國際鬥爭的實踐相結合，正式提出國際戰略的相關理論。大陸學界因此根據

---

[46] 李景治、羅天虹著，**國際戰略學**（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0-21。
[47] **鄧小平文選**（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 版第 3 卷，頁 375。
[48] 資中筠，「百年思想的衝擊與撞擊」，頁 7-29。
[49] 楊潔勉，**中國外交理論和戰略的建設與創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9-20。
[50] 倪建民、陳子舜，**中國國際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50。

鄧小平相關論述提出，國際戰略是以參與國際競爭為出發點，在較長時期內使用國家實力參與國際競爭來實現國家利益的總體方略，基本表現型態是國家的對外戰略，並且係由國際戰略目標、國際戰略方針（指實現國際戰略的各種途徑）和國際實力（手段）所組成。國家制定國際戰略，不僅要依據國家利益、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國際環境和國際情勢的趨勢變化，也要根據國家實力強弱進行評估，並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力所能及，量力而行，同時採取與本國實力相適應的具體方針、政策、方法、步驟，運用靈活的策略，巧妙利用國際關係的發展變化，以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在一定的歷史和環境條件下，進攻與防守、鬥爭與妥協、強硬與靈活、針鋒相對與韜光養晦，都可以用來維護國家利益。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戰略目標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外部環境，戰略方針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斷增強國家實力是實現此一戰略目標的必要手段，因為只有增強實力才能贏得他國的尊重。[51]

對中國而言，所謂國際經濟制度，實際上是「國際經濟關係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某種相對穩定格局、結構或模式；它涉及一系列原則、規則與制度，透過保障安全、減少交易費用促成資源有效配置」[52]。作為既有國際經濟制度的主要協定和組織之創始締約國，並享有相當程度的既得合法利益，中國基本上是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受益者，經濟全球化更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不必透過戰爭即可完成自身發展的戰略機遇。由於中共政府並未實際參與現行國際制度的創設過程，對中共而言，現行國際制度並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主要是反映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西方利益。美國擁有制度霸權的優勢地位，中國雖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卻始終堅持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身分自居，顯示中國對自身綜合實力仍不滿意，不僅無法按照其主觀意願改變國際政治結構，[53]亦難以將其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建立全球層次價值體系之有力支撐，因

[51] 李景治、羅天虹著，**國際戰略學**，頁 4-7，32-33。
[52] An Chen, “The Voice from China: An Chen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pringer-Verlag Press* (2013), p. 168.
[53]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頁 23-28。

而主張「堅持全面性、漸進性、實效性的原則，推動國際金融秩序不斷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反映出中國並不追求激進式的改革方案，而是企圖以主要利益方協調為基礎，對國際經濟制度進行必要改革，並以循序漸進、互利共贏原則推進國際經濟制度建設，同時透過改革和創新國際經濟制度協調、調節和制約與體系內其他國家的關係。

**表 2-1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領導人對國際經濟制度的論述**

| 時間 | 領導人與場合 | 對國際經濟制度的論述內容 |
|---|---|---|
| 1990 年 3 月 3 日 | 鄧小平<br>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 | 中國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 |
| 1992 年 10 月 12 日 | 江澤民<br>十四大政治報告 | 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此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
| 1997 年 9 月 12 日 | 江澤民<br>十五大政治報告 | 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還在損害著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致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
| 2002 年 11 月 8 日 | 江澤民<br>十六大政治報告 | 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
| 2007 年 10 月 15 日 | 胡錦濤<br>十七大政治報告 | 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
| 2012 年 11 月 8 日 | 胡錦濤<br>十八大政治報告 | 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
| 2016 年 1 月 16 日 | 習近平<br>亞投行開業儀式致辭 | 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促進各方實現互利共贏。 |
| 2017 年 2 月 17 日 | 習近平<br>主持中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 |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大方向沒有改變，要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

資料來源：**鄧小平文選**，頁 304；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中國共產黨新聞**，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6/c_1117796389.htm；「習近平主持召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 年 2 月 17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217/c64094-29089833.html。

## 第四節　國際經濟制度與美中關係

國家對外行為是在國際體系結構框架中界定的，實力對比是驅動國家利益和國際制度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美國是二戰之後國際經濟制度的塑造者和守護者，中國是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的後來者，也是二戰以來唯一有能力也有意願採取實際行動挑戰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的國家。檢視國際經濟制度所形成的結構，美中互動的戰略格局是美國試圖維持對中國不對等的制度約束，中國則是在尋求建立與美國對等的制度約束。[54]此不僅正在改變由美國長期主導國際經濟制度的壟斷格局，亦將調整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利與利益分配狀態，進而影響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

### 一、 國際經濟制度是美中戰略競合與相互制衡的場域

冷戰結束，前蘇聯解體，造成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戰略格局的根本變化。美國成為世界唯一霸權，前蘇聯因素的消失，同步終結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定位中「非盟國的盟友」角色，致使冷戰時期的美、蘇、中戰略三角關係解構，相應改變中國在美國全球政策中的戰略地位。由於中國不再是美國遏制前蘇聯的戰略夥伴，相形凸顯美中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對立。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市場化經濟改革過程迅速增強，雖然不至於造成對美國直接威脅，但是其政治制度和價值觀與美國有重大差異，加上中國對美政策仍存在鬥爭性，因此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的挑戰國家與可能威脅，中國是否會在前蘇聯瓦解後成為另一個新興霸權，以及中國崛起是否會影響「美國主導下的強制和平」（Pax Americana）的國際秩序，已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課題。

自尼克森總統與中國建交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定位歷經多次變化，從柯林頓的「建設性戰略夥伴」（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小布希的「戰略競爭者」

[54] 胡文秀，王瑋，「國際制度下的中美互動論析」，**社會主義研究（北京）**，第 2 期（2014 年），頁 164-170。

（strategic competitor）和「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歐巴馬由「希望雙方發展務實而有效的關係」到宣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並推動「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ing）戰略，將中國視為競爭者與潛在敵人；[55]目前川普政府則認為中國為美國的利益帶來挑戰，強調美「中」關係處於轉折點，並希望建立能夠維持建設性、合作與結果導向的雙邊關係。[56]

基本上，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始終保持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一方面設法維持權力平衡狀態，避免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另一方面採取整合手段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接受國際規範，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57]冀以增加中國對外行為的透明化與可預測性。這可說是典型的軟硬兩手策略，不會只使用硬權力的「圍堵」（containment）或「遏制」，或是僅專注軟權力的「接觸」或「交往」（engagement）政策，而是兩者同時進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曾將此軟硬兩手的策略稱之為「圍和」（congagement），但是在美中互動過程中仍會因為主觀需求與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有所偏重。[58]不論是「遏制」、「交往」抑或「圍和」策略，在本質上，美國都希望能夠透過「和平演變中國」方式，引導中國朝向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民主化方向發展，藉以轉化中國崛起對美國造成的潛在威脅。國際制度是一種規範性共識，也是美國用以塑造中國在國際體系定位與角色的戰略手段。美國認為，國際制度的存在與運作，反映了各國應該遵守相關規範的共同預期，此一預期係建立在國家行為體對彼此共同利益與目標的認知基礎之上，由於存在這樣的共識，中國在制度環境中將會被動接受美國價值觀與社會化的塑造，並在

---

[55] 胡聲平，「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臺美『中』關係的可能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5-20。

[56] 「提勒森：中方為美國利益帶來挑戰」，**聯合新聞網**，2017 年 4 月 7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4070012-1.aspx.

[57] 尼克森主張「中國人口佔全球的五分之一，不僅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也有成為經濟大國的潛力...中國在國際間的分量不容忽視，其勢力也不容世界孤立...必須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將其融入到國際社會之中」；參見尼克森(Richard Nixon)著，丁連財譯，**掌握時機（Seize the Moment）**（臺北：時報出版，1992 年），頁 156。。

[58] 邱坤玄，「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美『中』互動」，**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1 期（2005 年 11 月），頁 7。

參與互動和學習調適的過程中，逐漸適應自身作為制度成員的身分，同時使中國的對外行為受到制度化的制約，從而向美國所期待的方向轉變。

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制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擴大國際參與的主要方式，美國係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塑造者和主導者，此一態勢使國際經濟制度和美中兩國這三者之間形成一種互動的邏輯關係，美國與國際經濟制度存在控制、使用與反控制、約束的關係；中國與國際經濟制度是融入、改善與滲透、影響的關係；在制度規定的範圍內，美中之間係美國藉由國際經濟制度影響中國，中國則對美國也有反作用的關係。[59]作為主導創建國際經濟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國一直設法維護和延續其優勢地位，面對中國等制度的後來者，往往採取引導和遏制的手段，以利將之納入美國主導下的經濟霸權體系；對於正在崛起且實力持續增長的中國而言，則是以爭取與美國等制度先行者對等的國際地位並節制美國的單邊行為，以及逐漸擴大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作為融入現行國際經濟制度過程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 二、 國際經濟制度是中國擴展國家利益的戰略途徑

國際體系的結構是形成國際環境的基本因素，國家的根本利益係由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所界定。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根本國家利益是維持霸權體系和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從二戰到冷戰結束，兩極對立格局已不復存在，雖然美中兩國的經濟競爭日趨表面化，但是中國的國家實力增長仍然無法全盤改變國際體系的整體結構。國際格局變化只是體系內部的部分變化，由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仍然存在，只要霸權體系的整體結構沒有變化，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也就不會改變，維持霸權體系和美國霸權領導地位仍是美國國際戰略的核心，運用國際經濟制度遏制中國崛起也還是美國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59] 楊文靜，「中國融入國際機制與美國因素」，頁 144-159。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目標是找出各國重大利益的契合點。鑒於中國影響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能力有限，中國若要運用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制度來約束甚或反制美國並不是有效且可行的舉措，所以，在與美國互動時，中國致力設法降低美國利用國際經濟制度影響中國的能力，其所追求的是一種應對式（reactive）的目標。[60]對中國來說，秉持和平融入國際體系的對外戰略代表中國無意挑戰美國霸權和顛覆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的基本立場；若中國採取挑戰美國的策略，不僅將在經濟方面得不償失，亦將自證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並對中國所要形塑的「負責任大國」國際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中國在現行的國際經濟制度框架下，對美國進行軟制衡（soft-balancing）藉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較為合理且理性的戰略選擇。

中國認為，現行國際經濟制度長期被代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美國霸權所宰制和壟斷，存在諸多不公平、不合理現象，例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擁有「一票否決權」的絕對優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對於新興國家的信用貸款採取嚴格限制或以經濟改革作為附加條件限縮其經濟發展自主性等情形；美國的國力也許正在衰減，但還是可繼續透過這套制度增益其戰略資源，重新建構符合西方價值標準的國際經濟制度。[61]因此，在整體國力與美國仍存在相當差距的現實與認知下，中國並不尋求取代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只要美國不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也將極力設法避免與美國進行硬對抗，為了實現以國內經濟建設為中心、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的戰略目標，中國秉持改進與完善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立場，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制度建設，同時運用自身擁有的廣大市場與鉅額外匯存底，陸續主導發起和籌建亞投行（AIIB）、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區域性國際經濟制度，試圖與現行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組成的國際經濟制度和經濟體系形成平行架構，對其推展「一帶一路」戰略形成有效

[60] 胡文秀，王瑋，「國際制度下的中美互動論析」，頁 164-170。
[61]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 年），頁 90-66。

支撐，藉以增強國際影響力，進而促使國際經濟制度朝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且對中國較為有利的方向發展。

## 第五節　小結

國際關係的發展是國際制度產生的前提，國際制度的核心功能在於規範國家在國際體系內的行為選擇。二十世紀以來，國際制度的影響範圍和涉及領域日益廣泛，亦對國際關係發展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家願意參與國際制度的基本前提，主要在於參與國際制度有助解決各自所關切的事項，或是能夠更有效推進其國家利益。如果國家關切的事項不能透由參與國際制度獲得解決，將不會願意對國際制度投入有限的外交資源，換言之，國家在選擇融入國際體系的同時，並不會為了國際利益而放棄或犧牲自身的國家利益，而是會從符合自身利益的角度闡述國際規則，藉以維護其國家利益，並在現行國際結構下，設法探尋可促進其國家利益的途徑。

### 一、美國在國際經濟制度掌控主導性權力和總體優勢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經濟規模與國家實力的總體優勢非常明顯。即使在1970 至 1980 年代的低谷時期，也超過全球經濟總量的 20%，並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保持在全球經濟總量約 30%左右，使美國可對全球經濟發展發揮強大影響力。創建「布列敦森林體系」用以支配全球經濟，是美國在二戰後推展經濟霸權戰略的重要工具，「布列敦森林體系」包含兩大關鍵內容：以美元與黃金本位「雙掛鉤」的國際固定匯率體系，以及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據此，美國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實際上成為全球的中央銀行，美元亦成為全球通用貨幣，儘管國際固定匯率體系隨著美國的黃金儲備大幅減少而被「以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化國際儲備與浮動匯率」貨幣體系所取代，但是美元的霸權地位基本上維持下來，至今仍是最主要的世界貨幣，在

全球外匯儲備、國際外匯交易和國際貿易結算中平均約佔一半。時至今日，雖然美國對於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力相對減弱，但實際上並沒有改變美國在該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總體主導優勢。

## 二、美中透由國際經濟制度發展競合兼具的雙邊關係

霸權和霸權結構是國際關係的重要內涵，霸權結構的核心是被國際社會所認可，並牽涉國家如何互動的制度性安排。霸權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必須提供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的公共財，同時擔負建設國際制度的成本，並藉由其他國家遵循國際制度而獲益；透過國際制度，使霸權國家能夠以低廉的代價建立明確且可滿足該國長遠戰略利益的體系結構，概言之，國際制度安排是霸權體系結構的核心。美國被研究國際關係學者視為當代霸權的代表，主要原因在於它能獨自抵抗單一的或是聯盟型態的挑戰者，並且享有相對的權力盈餘。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美國與全球主要大國存在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不對等關係，美國一貫重視制定有形和無形的國際法規、規則和制度，冀能依循其所秉持的民主理念和價值觀塑造國際秩序，力圖按照美國的意願和利益建立相關國際制度，設法把自身的超強實力，轉化為國際社會對美國的支持與認同，同時將美國原則轉化為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性標準與規則，藉以鞏固和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中國崛起首先是在經濟領域崛起，在可預見的未來或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強權，因此美國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崛起的發展進程與戰略意圖，並積極設法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制度。美國作為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可藉由維持現行制度規範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因此對中國實施引導與遏制並重的國際制度戰略，其戰略目標就是要「規制」中國，使中國的對外行為符合國際規範，藉以降低中國崛起對國際體系可能造成的不確定性。中國為了不被視為制度的挑戰者，冀以營造有利其自身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並透過支持和融入現行國際經濟制度得到合法利益，故對美國採取既合作又牽制的國際制度戰略，

也就是說，在國際制度框架下開展對外交往符合美中兩國對國際制度的共同需要與總體戰略目標，亦使雙方在國際制度場域交往具有各取所需的特徵。國際經濟制度可為調節美中互動提供有效的制度途徑，在制度框架下尋求合作或解決分歧符合雙方的基本利益，惟當某一方基於自身需求不能被滿足而不予合作時，國際制度平台將難以發揮規範性的約束作用，甚或促使對現狀不滿的國家，基於實力增強的自信而倡議採取改革或創新等反制作為，以期在不破壞現有制度框架前提下，爭取與其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對等的國家利益。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儘管美中關係跌宕起伏，但總體上是中國主動向美國的利益做調適，觀察中國陸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並成為重要的成員國即為明顯例證，此一發展象徵中國接受了現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制度。具體而言，中國是以和平融入和參與國際經濟制度、而非推翻現行制度作為國家發展的方式和途徑，雖然中國選擇在制度內部解決矛盾與分歧，但這並不代表中國不能發展自己獨特的國際行為模式。在國際舞臺上，必須參與才能有發言權。在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的過程中，國際經濟制度具有規範中國對外行為，使其進一步實現市場化和國際化的作用，但是中國對於國際經濟制度並非單方面、無條件的接受，而是根據自身國情和國家利益，在接受制度規範的同時，設法將之修改、補充和完善，甚至創立新機制。

美國是全球經濟實力最強、國際影響力最大的霸權國家，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發展最快的區域大國。由於中國正在崛起，並逐步邁向強權，而美國已經是現狀霸權，根據傳統的國際政治學理論，競爭自然成為雙方關係的主要特點，但是，競爭未必會導致衝突，其關鍵在於兩國若能加強相互合作、聚焦共同利益，將有助於制衡或削弱競爭的負作用。對美國而言，中國逐漸成為區域和全球大國兼具挑戰與機會，挑戰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國際事務的觀點與美國顯著不同；機會則係兩國享有許多共同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美中兩國既有競爭，又有合作；既有摩擦，又有協調；彼此之間互有需要，可以避免全面衝突。在可預見的將來，

美中關係仍將介於戰略競爭與戰略夥伴之間的灰色地帶。美國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外在壓力與促動力，中國則是影響美國亞太戰略的關鍵考量。美中之間均有塑造對方戰略的意圖和期待，此將有助兩國進行正向互動。從實力對比角度來看，中國正在崛起，美國是否衰落雖然未有定論，即使美國衰落，也必將經歷長時間的漸進式過程，並不會驟然衰落。根據各式各樣的預測，中國的 GDP 總量可能在 2040 年甚至 2020 年將超過美國，即便如此，中國真正崛起成為超級大國仍需要一個漫長而漸進的歷程，中國未來可能對美國帶來經濟或政治的挑戰，但是中國的民族性與文化並不強調採取霸權征服手段。因此，中國崛起與美國霸權之間仍將長期存在同步發展空間，而不是一種全然對抗性的關係；縱使實力對比發生變化，也將體現為一種漸變而非驟變的發展趨向，此將為美中兩國透過各種途徑避免衝突、尋求合作提供基本保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三章　亞投行之成立與發展

近年來，亞洲經濟總體發展快速，區域經濟整合持續深化，但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仍不發達，融資需求巨大。基於促進亞洲地區和全球經濟「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理念，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3 年 10 月 2 日訪問印尼時，提出籌建亞投行之構想，並強調中國發起與成立亞投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援助，同時增進相關經濟產業合作。「一帶一路」係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東接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所貫穿而成的一條經濟帶。亞投行不僅可支撐中國推進其「一帶一路」戰略，亦可透由對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發電廠和電信網絡等領域的投資，增進中國與相關成員國的共同利益與合作關係。[1]儘管亞投行在創建過程中，曾經引發許多國家基於難以權衡是否會對自身與美國的關係帶來負面影響，而對申請加入與否搖擺不定，以及歐盟會員國係由各國自行決定，而不是以影響力更大的歐盟名義加入亞投行來彰顯歐盟團結等問題，但是在中國積極主導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簡稱《亞投行協定》）於 2014 至 2015 年間召開五場談判代表會議及完成各種重要步驟，已經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生效，亞投行亦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開始營運。[2]

## 第一節　亞投行之創設源起

### 一、亞投行之成立背景

亞洲擁有全球六成人口，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 1/3，是當今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但因各國政府建設資金有限，部分國家與地區的鐵路、

[1] 王宏仁，「大陸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5 年 3 月），頁 14-17。

[2] 薛健吾，「亞投行正式營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30 期（2016 年 2 月），頁 42-50。

公路、橋樑、港口、機場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對該區域的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估計，2010 年至 2020 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總額至少需要 8 兆美元，平均每年約需投資 8,000 億美元，其中包括新建及修復取代的能源設施 4,088 億美元、通訊設施 1,055 億美元，交通設施 2,466 億美元，以及水暨衛生設施 381 億美元，尤以新建能源電廠及交通設施資金需求最鉅，分別為 3,176 億美元及 1,762 億美元。在 8 兆美元部分，68%用於新增基礎設施投資，32%是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的資金。[3]目前亞洲開發銀行總資金約 1,600 億美元，世界銀行亦僅 2,230 億美元，該兩家銀行每年能夠提供給亞洲國家與地區的資金僅約 200 億美元，實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

2013 年 10 月 2 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印尼前總統蘇西洛（General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會談時表示，為促進亞太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倡議籌建亞投行，願向包括東協國家在內的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亞投行將與亞洲域內、外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合作，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亞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4]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月出訪東南亞時亦提出相關倡議。習近平另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發表主旨講話時指出，中國將與各國一起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儘早啟動亞投行，更加深入參與區域合作進程。[5]其後，習近平於 2014 年 11 月 4 日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時強調，要以創新思維辦好亞投行；亞投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要注意按照國際慣例辦事，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金融機構長期積累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制定和實施嚴格的規章制度，並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亞投行與其他全球和

[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09), pp. 165-171.

[4] 「習近平同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舉行會談」，**中國外交部**，2013 年 10 月 2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fmprc.gov.cn/ce/cedk/chn/zgwj/t1084175.htm.。

[5] 「習近平：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 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新華網**，2014 年 5 月 21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

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關係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並且將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下運行。[6]

## 二、 中國創建亞投行之動機與意涵

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經貿組織，被外界視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下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將推進籌建亞投行作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金融通」合作重點之一，[7]希望藉由跨國資金投入，協助亞洲國家發展基礎建設，強化中國與中亞及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連結，進一步帶來各方面的合作。[8]由於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改革進展不符中國經濟崛起後，對於制度革新的期待，為了改變在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不利地位，中國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以援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為切入點，正式設立亞投行。中國藉由創設亞投行對外提供資金支援的信用貸款行為，以及受貸國向中國採購設備和產品的機會，輸出大陸的過剩產能及基礎建設技術，紓解國內經濟調控壓力、失業，以及原料滯銷等問題，同時彌補現行國際經濟制度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缺口，[9]並加速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降低中國鉅額美元外匯儲備所造成潛在風險和負擔，[10]對中國推展「一帶一路」戰略形成有效支撐。[11]

---

[6] 「習近平：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新華網**，2014 年 11 月 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6/c_1113146840.htm

[7]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2015 年 3 月 2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8] 陳宗巖，「臺灣參與亞投行的效益評估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研析**，123 期（2015 年 7 月），頁 21-28。

[9] 李瓊莉，「中國大陸周邊外交之政經作為—對外援助」，頁 157-163。

[10] 截至 2017 年 5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為 3 兆 105.17 億美元，資料來源：參見「中國國家外匯儲備規模」（2017 年 1-5 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網址：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tjsj_lnwhcb。

[11] 吳福成，「中國大陸推動建立多邊開發銀行的戰略思維」，**經濟評論**，第 188 期（2015 年 5 月），第 9 頁。

中國創建亞投行有兩層意涵，首先，中共在 2012 年十八大揭示其經濟發展目標為 2020 年 GDP 達到 2010 年的兩倍，欲達到此一目標需要每年平均 7.5％的經濟成長率，過去自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到 2010 年的 30 年間，中國平均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10％，2011 年增長 9.3%，2012 年及 2013 年減慢至 7.7%，2014 年及 2015 年持續下降為 7.3%和 6.9%，2016 年則減至 6.7%，[12]2017 年經濟成長率預期目標亦調降為 6.5%，[13]（1978-2016 年中國經濟成長率統計表如下頁表 1）此一趨勢發展反映出，在習近平宣示大陸經濟將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走向後，[14]中國顯然需要借助投資亞洲開發中國家基礎設施，以緩解大陸經濟成長動能不足的問題。其次，雖然中國試圖透由投資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來拉動自身經濟成長，但亦面臨周邊國家可能抗拒中國藉投資基礎設施對其投射影響力的問題，因此，中國冀能運用亞投行的多邊投資平臺，稀釋周邊國家對中國主導其基礎設施建設的疑慮，[15]並採取無附加政治條件的援貸方式，開創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16]同時運用一個類似霸權穩定的途徑來進行經濟戰略操作，透過亞投行把援助亞洲開發中國家的作為加以制度化，藉以營造並鞏固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領袖」的領導地位，從而確保亞洲區域經濟整合可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來進行。[17]

---

[12] 曾詩韻，「中國經貿概況」，**香港經貿發展局經貿研究**，2017 年 5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數據及指數/中國經貿概況/ff/tc/1/1X000000/1X09PHBA.htm。

[13] 「李克強：2017 年 GDP 預期增長目標為 6.5%左右」，**新華網**，2017 年 3 月 5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2017-03/05/c_1120570377.htm。

[14] 「謀求持久發展 共築亞太夢想－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11 月 9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10/c64094-26001014.html。

[15] 黃美鳳，「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118 期（2015 年 2 月），頁 4-12。

[16] 「亞投行開創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南南合作網**，2015 年 5 月 20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19 日，網址：http://www.ecdc.net.cn/news/detail.aspx?ClassID=8&ContentID=3352。

[17] 薛健吾，「亞投行正式營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頁 42-50。

## 表 3-1　1979-2016 年中國經濟成長率統計表

| 年份 | 經濟成長率（%） | 年份 | 經濟成長率（%） |
|---|---|---|---|
| 2016 | 6.7 | 1997 | 9.2 |
| 2015 | 6.9 | 1996 | 9.9 |
| 2014 | 7.3 | 1995 | 11.0 |
| 2013 | 7.8 | 1994 | 13.0 |
| 2012 | 7.9 | 1993 | 13.9 |
| 2011 | 9.5 | 1992 | 14.2 |
| 2010 | 10.6 | 1991 | 9.3 |
| 2009 | 9.4 | 1990 | 3.9 |
| 2008 | 9.7 | 1989 | 4.2 |
| 2007 | 14.2 | 1988 | 11.2 |
| 2006 | 12.7 | 1987 | 11.7 |
| 2005 | 11.4 | 1986 | 8.9 |
| 2004 | 10.1 | 1985 | 13.4 |
| 2003 | 10.0 | 1984 | 15.2 |
| 2002 | 9.1 | 1983 | 10.8 |
| 2001 | 8.3 | 1982 | 9.0 |
| 2000 | 8.5 | 1981 | 5.1 |
| 1999 | 7.7 | 1980 | 7.8 |
| 1998 | 7.8 | 1979 | 7.6 |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二節　亞投行之制度設計

亞投行是按照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作、重點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政府間性質之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的設立目標是創建一個平等、包容和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18]根據亞投行 57 個意向創始會員國於 2015 年 6 月 29 日簽署，並且在同年 12 月 25 日生效的《亞投行協定》，可以從亞投行成立宗旨、銀行職能、成員國資格、業務對象、業務定位、業務原則、融資條件、管理架構等組織章程，深入探討亞投行之制度設計。

### 一、成立宗旨

亞投行成立宗旨係透過對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並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並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夥伴關係，共同應對發展挑戰。另《亞投行協定》所稱「亞洲」和「本區域」，係根據聯合國定義的亞洲和大洋洲等地理劃分。[19]

### 二、銀行職能

亞投行為履行其成立宗旨，應具備「推動區域內發展領域的公共和私營資本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發展」、「利用其可支配資金為本區域發展事業提供融資支持，包括最能有效支持本區域整體經濟和諧發展的項目和規劃，並特別關注亞洲區域欠發達成員的需求」、「鼓勵私營資本參與投資有利於區域經濟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發展的項目、企業和活動，並在無法以合理條件獲取私營資本融資時，對私營資本進行補充」，以及「為強化上述職能開展的其他活動和提供的其他服務」等職能。[20]此外，透過金融槓桿的

[18] 舒建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國際金融秩序」，**國際關係研究（北京）**，第 4 期（2015 年），頁 15-26。
[19]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1 條規定。
[20]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 條規定。

作用，亞投行的法定資本額 1,000 億美元應可放大 5-10 倍，並創造出 5,000 億至 1 兆美元的資金支援規模，對於亞洲地區到 2020 年平均每年基礎建設投資高達 8,000 億美元的資金需求，應能提供有力的經濟支持。[21]

## 三、成員國資格

亞投行成員國資格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之亞洲域內、外成員開放。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國，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亞投行成員國同意或代其向亞投行提出加入申請。[22]

在創始會員國部分，各國除了應該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提出意向申請外，根據《亞投行協定》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和第 58 條規定，各個意向創始會員國必須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依照該國內部合法程序同意簽署《亞投行協定》，並於前述期限內將該國的核准文件向《亞投行協定》保存人（中國政府）交存，方能正式取得創始會員國資格。[23]在 57 個亞投行創始會員國中，目前仍有巴西（受到前總統羅賽芙 2016 年 8 月遭彈劾及政府缺乏資金等影響而延宕）、南非（以處理新開發銀行事務為優先，亞投行次之）、科威特、西班牙等 4 國迄未於《亞投行協定》規定期限內，完成其國內簽署《亞投行協定》之程序，並已獲得亞投行理事會同意延期 12 個月（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24]

## 四、業務對象

亞投行可向任何成員國或其機構、單位、行政部門或在成員國的領土經營之任何實體或企業，以及參與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國際或區域性機構提供融資。[25]

---

[21] 吳福成，「中國大陸推動建立多邊開發銀行的戰略思維」，第 9 頁。
[22]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3 條規定。
[23] 依據《亞投行協定》第 57 條規定，《亞投行協定》之保存人為中國政府。
[24] "China-led AIIB gives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extra year to joi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8, 2017,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0c0f6f2-1384-11e7-b0c1-37e417ee6c76?mhq5j=e2.
[25]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

## 五、 業務定位

亞投行的業務定位為準商業性，並且具備提供商業借貸而非全然為減貧借貸的特徵。[26]初期係對成員國的基礎建設提供主權貸款，並設立信託基金，以應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同時引入「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模式」（PPP），透過亞投行和相關國家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並採取「銀行＋基金」的模式進行營運，以確保其資金規模。[27]此外，亞投行係以「直接貸款、聯合融資或參與貸款」、「參與機構或企業的股權資本投資」、「對全部或部分用於經濟發展的貸款提供擔保，並且作為直接或間接債務人」、「根據特別基金使用協定，配置特別基金資源」、「提供技術諮詢、援助或其他類似形式的援助」、「由理事會以特別多數投票通過的其他融資方式」等方法開展業務。[28]

## 六、 業務原則

亞投行業務開展原則為「不得在成員國反對的情況下，在該成員國境內開展融資業務」、「審議融資申請時，應綜合考慮有關因素，同時適當關注借款方以亞投行認為合理之條件從別處獲得資金的能力」、「提供或擔保融資時，應適當關注借款方及擔保方未來按融資契約規定的條件履行其業務之可能性，並應採取亞投行認為適合該項融資風險的利率、其他費用和還本安排等融資條件」、「不可對融資項目的貨物和服務採購進行國別限制」、「應採取必要措施保證亞投行提供、擔保或參與的融資資金僅用於融資所規定的目標，並應兼顧節約和效率」、「應儘可能避免將過多資金用於單一或某些成員國的利益」、「應設法保持亞投行股權資本投資的多樣化。除非出於保護投資的需要，否則亞投行在其股權投資

---

[26] Gregory T. Chi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rospects,” *Global Governance*, Vol. 22, Issue 1 (January-March 2016), pp. 18-21.

[27] 趙永祥、吳依正，「從亞投行與一代一路看中國海外經濟版圖擴張與對臺灣經濟發展之影響」，**全球管理與經濟**，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99-118。

[28]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11 條第 2 款規定。

項目中，對所投資的實體或企業不應承擔任何管理責任，也不應尋求對該實體或企業的控制權」。[29]

## 七、融資條件

亞投行在發放、參與或擔保貸款時，應依照前項之業務原則及《亞投行協定》其他條款的規定，充分考量保障銀行收益和財務狀況需求來訂立契約，以明確該貸款或擔保的條件；當貸款或擔保對象非亞投行成員國時，若亞投行評估後認為可行，可要求該貸款或擔保項目執行所在地的成員國，或者該成員國之某個政府或其他機構，為貸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費用的按期履約償還提供擔保；任何股權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亞投行董事會政策文件所允許對該實體或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的比例；另按照「貨幣風險最小化」的政策規定，亞投行可以使用成員國的本國貨幣對亞投行在該國的業務提供融資。[30]

## 八、管理架構

亞投行的核心理念是精幹（lean）、廉潔（clean）、綠色（green），並致力促進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31]建構一個高效、靈活、架構簡單、運作方便的機構，同時，藉由採購專業服務方式，避免業務運行和機構本身造成腐敗的機會，以及信貸政策遵循綠色和永續發展的原則。亞投行管理架構設有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等三層。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依據《亞投行協定》之章程規定，可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決策權力。在決策流程方面，亞投行理事會採用簡單多數、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等原則決策，理事會討論的議題，應由簡單多數決定；接納新會員國採用多數決原則決議；選舉行長、增加資本、協改協定、下調亞洲

[29]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13 條規定。
[30]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14 條規定。
[31] 「亞投行意向創始會員國將超過 35 個 將對腐敗零容忍」，**新華網**，2015 年 3 月 22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2/c1114721926.htm。

域內出資比例等重大事項則以超級多數批准。[32]此外，亞投行不設置常任理事會，並僅設置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開會就重大政策進行審議，[33]並建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的責任。[34]此一「非常駐」的管理機制，被視為是有別於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新作法，有助於精簡組織結構、提高運作效率及降低營運費用，進而將資金運用於相關投資項目。[35]同時也呼應世界銀行「現代化治理機制」高階委員會（High-Level Commission on Modernization）於 2009 年提出的報告，該報告對世界銀行設置常駐執行董事會，負責核准所有新政策與借貸計畫的作法提出批評，認為此一作法雖可形成管理上的制衡機制，但相對需耗費每年 700 萬美元的高額人事支出，易減緩相關計畫準備進程，使世界銀行的運作效率不彰，亦會加深執行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緊張關係。[36]（有關亞投行的組織結構將於第四章第一節進行深入探討）

## 第三節　亞投行之發展現況

習近平在亞投行開業儀式致辭時指出，亞投行將有效增加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多渠道動員各種資源、特別是私營部門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亞投行也有利於改善亞洲發展中成員國的投資環境，創造就業機會，提升中長期發展潛力，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積極提振作用；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是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中國將繼續歡迎包括亞投行在內的新、舊國際金融機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

---

[32]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8 卷，第 2 期（2017 年 4 月），頁 1-44。

[33] 吳福成，「中國大陸推動建立多邊開發銀行的戰略思維」，頁 8-10。

[34] 樓繼偉，「開放包容、互利共贏：打造二十一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人民日報**，2016 年 6 月 25 日，版 10。

[35] 郭可為，「崛起中的亞投行－中國提升全球領導力的試驗場？」，**中國經濟報告（北京）**，第 7 期（2015 年），頁 100-105。

[36]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Modernization of World Bank Group Governance, *Zedillo Commission Report: Repowering The World Bank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9), pp. 17-20;轉引自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頁 24。

建設，使亞投行成為專業、高效、廉潔的 21 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37]亞投行的共同願景就是促進連通性，鋪砌一條共同發展、共用成果的道路。[38]

## 一、 亞投行之發展紀要

亞投行從 2013 年 10 月提出倡議、2014 年 10 月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2015 年 6 月簽署《亞投行協定》到 2015 年 12 月正式成立，並且自 2016 年 1 月 16 日開始營運，整體發展過程快速，引起全球關注。儘管亞投行係以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主要投資標的，但是其成員國橫跨亞洲、歐洲、中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等地區，因而被廣泛且潛在地被視為具備如同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全球性多邊開發銀行的角色，[39]不僅對現有國際經濟制度造成衝擊，也將持續影響全球經濟治理與國際秩序的發展。（有關中國創建亞投行之發展紀要整理如表 3-2）

**表 3-2　中國創建亞投行之發展紀要**

| 時間 | 事件 |
|---|---|
| 2013 年 10 月 | 習近平和李克強分別在出訪雅加達及東南亞時，首次倡議籌建亞投行。 |
| 2014 年 3 月 12 日 | 成立亞投行籌建工作組，中國前副財長金立群擔任組長。 |
|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中國和印度、新加坡、孟加拉、汶萊、柬埔寨、哈薩克、科威特、寮國、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斯里蘭卡、烏茲別克、泰國、和越南等 21 國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 |
|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印尼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成為第 22 個意向創始會員國。 |
| 2015 年 3 月 12 日 | 英國宣佈申請加入亞投行意向創始會員國，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地區和西方國家。 |

[37] 「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6/c_1117796389.htm。

[38] 「亞投行行長：今年還會有 15 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聯合新聞網**，2017 年 3 月 25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333/2364440。

[39] 濱中慎太郎，「亞洲開發銀行、亞洲貨幣基金、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室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建區域金融制度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3（2016 年 1 月），頁 119-134。

| | |
|---|---|
| 2015 年 3 月 13 日 | 法國、義大利、德國表態申請加入亞投行意向創始會員國。 |
|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南韓、俄羅斯、巴西在截止期限前申請加入亞投行。 |
| 2015 年 4 月 15 日 | 確認 57 個意向創始會員國，其中亞洲區域內國家 37 個、區域外國家 20 個。東協 10 國全數加入，歐盟有 14 國加入，20 國集團（G20）中有 14 國加入，金磚 5 國亦全部躋身首發陣容。全球五大洲皆有國家加入。 |
| 2015 年 6 月 29 日 | 57 個意向創始會員國在北京簽署《亞投行協定》。 |
|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中國前財長樓繼偉宣布《亞投行協定》正式生效，亞投行正式成立。 |
| 2016 年 1 月 16-18 日 | 在北京舉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成立大會，中國前財長樓繼偉獲選擔任首屆理事會主席。 |
| 2016 年 2 月 5 日 | 公佈 5 位副行長及其分工。 |
| 2016 年 6 月 24 日 | 批准首批貸款 5 億 9 百萬美元，其中與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聯合放貸約 3 億 4 千 4 百萬美元。 |
| 2016 年 6 月 25、26 日 | 以「基礎設施發展夥伴」（Partnership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為主題，在北京舉行首屆理事會年會，會中選舉韓國理事柳一鎬（Ilho Yoo）擔任第二屆理事會主席，喬治亞和英國理事為副主席。 |
| 2016 年 9 月 27 日 | 批准第二批貸款 3 億 2 千萬美元，其中與世界銀行聯合放貸約 3 億美元。 |
| 2016 年 12 月 8 日 | 批准對阿曼王國放貸3億1百萬美元，亦為首次對港口（杜庫姆港, Duqm）、鐵路，以及阿拉伯半島國家提供貸款。 |
| 2016 年 12 月 21 日 | 批准對亞塞拜然跨安納托利天然氣管線建設項目（TANAP）放貸 6 億美元；TANAP 總成本為 86 億美元，由亞投行、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共同放貸。 |
| 2017 年 3 月 22 日 | 批准三項貸款計 2 億 8 千 5 百萬美元，其中與世界銀行聯合放貸約 1 億 2 千 5 百美元。 |
| 2017 年 3 月 23 日 | 新增 13 個成員國，包括阿富汗、亞美尼亞、斐濟、香港、東帝汶等 5 個亞洲域內國家和比利時、加拿大、衣索比亞、匈牙利、愛爾蘭、秘魯、蘇丹和委內瑞拉等 8 個域外國家，成員國總數達 70 個。 |
| 2017 年 5 月 2 日 | 批准對印度首次放貸 1 億 6 千萬美元，用以升級安德拉普拉迪什邦（state of Andhra Pradesh）的輸配電網項目；另世界銀行亦對該項目放貸 2 億 4 千萬美元。 |

| | |
|---|---|
| 2017 年 5 月 13 日 | 新增 7 個成員國，包括巴林、賽普勒斯、薩摩亞等 3 個亞洲域內國家和玻利維亞、智利、希臘、羅馬尼亞等 4 個域外成員國加入，成員國總數達 77 個。 |
| 2017 年 6 月 15 日 | 批准三項貸款計 3 億 2 千 4 百萬美元,其中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及歐亞開發銀行聯合放貸約 1 億 7 千 4 百萬美元。 |
| 2017 年 6 月 16 日 | 新增 3 個成員國，包括東加王國等 1 個亞洲域內國家和阿根廷、馬達加斯加等 2 個域外成員國加入，成員國總數達 80 個。 |
| 2017 年 6 月 16-18 日 | 以「可持續基礎設施」（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為主題，在南韓濟州島舉行第二屆理事會年會，會中公布「亞洲可持續能源戰略」、宣布支持會員國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相關減排目標、並選舉印度理事 Shri Arun Jaitley 擔任第三屆理事會主席，哈薩克和挪威理事為副主席，決議第三屆年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25 至 26 日在印度孟買舉行。 |

資料來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網站**，http://www.aiib.org/html/NEWS/。

## 二、 亞投行與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存在合作互補關係

在亞洲基礎設施融資需求巨大的情況下，由於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存在互補而非競爭關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亞投行開業儀式致辭表示，「亞投行應同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相互補充，促進多邊機構共同發展；亞投行應按照多邊銀行模式和原則運作，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經驗和做法，取長補短，高起點運作，努力成為一個互利共贏和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40]反映出中國係將籌設亞投行作為切入點，逐步推動改進與完善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意圖，亦有藉亞投行作為延伸外交政策與經濟目標的資金運用平臺，搭配「絲路基金」與「一帶一路」戰略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戰略考量。[41]

[40] 「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6/c_1117796389.htm。

[41] 習近平於 2014 年 11 月 8 日在「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會」宣布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fund），用以推動亞洲地區經濟發展，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開發及產業合作等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參見“China to establish $40 billion 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fund”, *Reuters*, November 8, 2014, 檢閱日期 2016 年 4 月 3 日，網

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現行國際經濟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借款，皆採取嚴格限制或提出減貧、財政改革與加強監管等諸多不能實際滿足其發展目標的要求，並主要關注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利益及提供特別待遇，至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需求則往往冷漠以待，或嚴重削弱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的自主性，致使發展中國家被迫依附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而積怨不滿。亞投行成立將有助彌補現行世界金融體系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的缺口，一方面能繼續推動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進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對當前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亞太地區投融資與國際援助職能的有效補充。自 2016 年 4 月以來，亞投行陸續與世界銀行、[42]亞洲開發銀行、[43]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44]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45]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46]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暨美洲投資公司（Inter-Americ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IIC）等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簽署「融資架構協定」（co-Financing Framework Agreement）或「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47]另亞投行亦自 2017 年 6 月接連獲得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48]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49]標準

---

址：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china-diplomacy-idUKKBN0IS0BU20141108.

[42] "World Bank and AIIB Sign First Co-Financing Framework Agreement", *World Bank*, April 13, 2016, accessed May 25,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6/04/13/world-bank-and-aiib-sign-first-co-financing-framework-agreement; " World Bank and AIIB Sign Cooperation Framework," *AIIB*, April 23, 2017,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423_002.html.

[43] "AIIB, ADB sign MOU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IIB*, May 2, 2016,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6/20160502_001.html.

[44]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o cooperate with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IIB*, May 11, 2016,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6/20160511_001.html.

[45]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agre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IIB*, May 30, 2016,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6/20160530_001.html.

[46]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New Development Bank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IIB*, April 11, 2017,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401_001.html.

[47]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IDB Group Expand Ties," *AIIB*, May 16, 2017,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516_001.html.

[48] "AIIB Receives Triple-A Credit Rating," *AIIB*, June 29, 2017, accessed July 22, 2017, https:

普爾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等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分別給予 Aaa/Prime-1（Moody's）、AAA/F1+（Fitch）、AAA/A-1+（S&P）的信用評級，[50]據亞投行財務主管索倫（Soren Elbech）表示，獲得良好的國際信用評級對亞投行的國際資本市場地位至關重要，使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位於同一水準。[51]透過與前述以美國、日本、歐盟為中心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聯合融資、爭取國際機構評級認可等具體作法，不僅有助管控亞投行營運起步階段的投資風險，亦有試圖破除西方國家對亞投行的運作透明度、資金適足率及管理能力、缺乏與外國政府溝通經驗等質疑，同時達到尊重環保與人權等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等目標。[52]

此外，亞投行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布首批 4 個貸款項目，總金額 5 億 9 百萬美元，其中除「孟加拉電力輸配系統升級擴建項目」由亞投行單獨放貸 1 億 6 千 5 百萬美元外，其餘「印尼國家貧民窟改造升級」（2 億 1 千 6 百 5 拾萬美元）、「巴基斯坦國家高速公路」（1 億美元）與「塔吉克邊境道路改善計畫」（2 千 7 百 5 拾萬美元）等，皆是與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多邊開發機構聯合放貸，[53]而在後陸續核准的貸款項目中，亦有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及其他多邊商業銀行聯合貸款的情形，此種合作方式將有助亞投行與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發揮合作互補及互惠效果。截至 2017 年 6 月為止，亞投行已向 9 個創始會員國提供貸款，範圍包括電力輸配系統、公路、鐵路、港口、發電廠、水壩、天然氣等基礎設施，總貸款金額為 24 億 9 千 9 萬美元。（2016 至 2017 年亞投行貸款國家、項目及金額統計如表 3-3）

---

//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629_001.html.

[49] "AIIB Receives Second Triple-A Credit Rating," *AIIB*, July 13, 2017, accessed July 22,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713_001.html.

[50] "AIIB Receives Third Triple-A Credit Rating," *AIIB*, July 18, 2017, accessed July 22, 2017,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718_001.html.

[51] 「亞投行獲惠譽最高信用評級」，**新華網**，2017 年 7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16/c_1121326403.htm。

[52] "The AIIB and Human Rights," *The Diplomat*, June 24, 2016, accessed June 17, 2017, http://thediplomat.com/2016/06/the-aiib-and-human-rights/.

[53] "AIIB's Board of Directors Approves $509 M Financing for its First 4 Projects: Power, Transport and Urban Investments span South, Southeast and Central Asia", *AIIB*, June 24, 2016, accessed May 25, 2017, http://www.aiib.org/html/2016/NEWS_0624/119.html.

## 表 3-3　2016 至 2017 年亞投行貸款國家、項目及金額統計

| 日期 | 貸款國家 | 貸款項目 | 貸款金額（美元） | 聯貸銀行 |
|---|---|---|---|---|
| 2016.6.24 | 孟加拉 | 電力輸配系統升級擴建 | 1 億 6 千 5 百萬 | 無 |
| 2016.6.24 | 印尼 | 國家貧民窟改造升級 | 2 億 1 千 6 百 5 拾萬 | 世界銀行 |
| 2016.6.24 | 巴基斯坦 | M-4 國家高速公路 | 1 億 | 亞洲開發銀行 |
| 2016.6.24 | 塔吉克 | 邊境道路改善計畫 | 2 千 7 百 5 拾萬 |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
| 2016.9.27 | 巴基斯坦 | 水電站擴建工程 | 3 億 | 世界銀行 |
| 2016.9.27 | 緬甸 | 225 百萬瓦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發電廠 | 2,000 萬 | 亞洲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 |
| 2016.12.8 | 阿曼王國 | 鐵路系統、杜庫姆港基礎設施工程 | 3 億 100 萬 | 無 |
| 2016.12.21 | 亞塞拜然 | 跨安納托利天然氣管線建設項目（TANAP） | 6 億 | 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
| 2017.3.22 | 印尼 | 水壩改善與安全工程 | 1 億 2 千 5 百萬 | 世界銀行 |
| 2017.3.22 | 印尼 | 區域基礎設施 | 1 億 | 世界銀行 |
| 2017.3.22 | 孟加拉 | 天然氣基礎設施 | 6,000 萬 | 亞洲開發銀行 |
| 2017.5.2 | 印度 | 升級安德拉普拉迪什邦（state of Andhra Pradesh）輸配電網項目 | 1 億 6 千萬 | 世界銀行 |
| 2017.6.15 | 喬治亞 | 巴統市（Batumi）繞城公路 | 1 億 1 千 4 百萬 | 亞洲開發銀行 |
| 2017.6.15 | 印度 | 投資印度基礎設施基金 | 1 億 5 千萬 | 無 |
| 2017.6.15 | 塔吉克 | 努列克（Nurek）水力發電廠改建工程 | 6,000 萬 | 世界銀行、歐亞開發銀行 |
| 合計 | 貸款國家：9 個；總貸款金額：21 億 7 千 5 萬美元。 | | | |

資料來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網站**，https://www.aiib.org/en/projects/approved/index.html.

## 三、美國對亞投行的態度及因應作為

基礎設施之投資為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雙邊協定以外，美國等西方國家多利用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制度平台，與受援國洽談財政援助方案與實施程序。然而，這套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制度，近來卻受到中國倡議創建的亞投行所挑戰，部分歐洲國家宣布支持亞投行，美國因為不希望亞投行成為北京的外交工具而對亞投行採取批判立場。[54]歐巴馬政府反對亞投行的理由，主要是亞投行不具備應有的國際監管標準及透明度、可能降低國際貸款標準，並以更為寬鬆的貸款條件來與現有的多邊開發機構和多國貸款方相抗衡。

亞投行係從 2014 年 3 月開始籌備，起初美國採取強烈反對和抵制態度，並極力勸阻南韓、澳洲及歐洲盟邦不要加入，但在東協十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瑞士、盧森堡等歐亞盟邦陸續加入成為創始會員國，增加中國創設亞投行的地理包容性與正當性後，使美國擔憂中國藉由亞投行擴張其在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將直接挑戰美國與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政經主導地位，並開始改持不反對之立場，但希望亞投行能具備高標準和透明度。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與日相安倍晉三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在白宮舉行聯合記者會表示，渠原則上不反對亞投行，但強調美國關切亞投行運作透明度和審核放款的規範，能否向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看齊；[55]美國財政部前部長路傑克（Jack Lew）指出，任何新的國際開發機構都應該尊重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現有機構，並應與現有機構維持同樣的標準；[56]另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席茨（Nathan Sheets）亦認為，若亞投行達到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同等級的治理與運行標準，並能與該等國際組織合作，將有助完善國際金融體系，彌補基礎設施資金缺口，美國將表示歡迎。由於歐巴馬政府保守應對亞投行，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撰文

---

[54] 蔡裕明，「美國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認知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研析**，第 121 期（2015 年 5 月），頁 5-11。

[55] 「歐巴馬首提亞投行：未反對各國加入」，**聯合新聞網**，2015 年 4 月 30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6809/872138。

[56] 「美轉向樂見亞投行要求高標準」，**旺報**，2015 年 4 月 2 日，版 3。

直言，美國處理亞投行的方式是過去 70 年來未曾有過的失敗，如能痛定思痛，或許還有機會，否則，美國可能隨時會失去其做為全球經濟體系「主事者」（underwriter）的角色，並退出國際舞台的中心位置。[57]美國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福山（Francis Fukuyama）亦認為，中國以亞投行證明自己能夠主導設立一個採用國際標準的國際組織，美國若能加入亞投行，將可發揮更大的影響力。[58]

亞投行係在美國歐巴馬執政時期由中國所倡議及創設，當時為了降低亞投行在經濟領域對美國「亞太在平衡」政策的衝擊效應，歐巴馬政府同時從國際經濟制度和國際政治採取相關因應舉措。在國際經濟制度方面，美國推促國際貨幣基金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決議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 SDR）組成貨幣，[59]並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國際貨幣基金根據中國大陸的經貿規模、經濟總量及人民幣國際支付總額換算，將人民幣「特別提款權」權重定為 10.92%，超越日圓的 8.33%和英鎊的 8.09%，僅次於美元的 41.73%和歐元的 30.93%，象徵人民幣躍升全球第 3 大國際貨幣。[60]其後，美國國會於 2016 年 1 月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第 14 次配額與管理改革案，將中國的投票權由 3.8％提高至 6.09％，[61]美國的投票權則由 16.7％略減為 16.5％，使中國自此在國際貨幣基金的配額與投票比重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62]在國際政治方面，歐巴

---

[57] "Why Larry Summers needs to lighten up a littl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 2015,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5/04/20/why-larry-summers-needs-to-lighten-up-a-little/?utm_term=.75ad122536f1.

[58] 「福山：美若入亞投行 影響力更大」，**中時電子報**，2017 年 4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16000651-260302。

[59] 「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於 1969 年創造並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只能用於會員國政府間結算，會員國可以用「特別提款權」向其他會員國換取可自由兌換的外幣，支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國際貨幣基金貸款；參見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IMF*, April 21, 207, accessed May 25, 2017, 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4/51/Special-Drawing-Right-SDR.

[60]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組成貨幣的決議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認同中共當局過去多年來在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等方面獲得進展。

[61] 「人民幣正式納入 IMF 特別提款權 權重 10.92％」，**自由時報電子報**，2016 年 10 月 1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19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843209。

[62] 國際貨幣基金理事會於 2010 年 12 月 15 日核准第 14 次配額與管理改革案，使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擁有更大的投票權，但遭美國拖延阻擋。改革後，國際貨幣基金的配額加倍並重新分配，削減歐洲先進經濟體與波灣國家的重要性，提升中國等發展中及新興國家的角色與分量；參見「IMF 投票權 陸躍第三大國」，**經濟日報**，2016 年 1 月 29 日，A7 版。

馬政府先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主導加速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冀能透由該「協議」相關機制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地緣重疊性，提高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成本，確保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規則制定權；[63]嗣於 2016 年 2 月 15 至 16 日在美國加州首度主辦「美國與東協特別峰會」（US-ASEAN Special Leader's summit），展現聯合東協制衡中共之戰略意圖，同時藉由拓展 TPP 增進與東協國家的合作關係，以穩固亞太政經主導權。

## 四、 亞投行可能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 （一）會員國存在政治矛盾與利益衝突：

亞投行的業務定位為基礎設施投資而非無償援助，對於各項貸款及投資皆需將風險與收益同時納入考量。亞洲基礎設投資缺口多數位於地緣安全風險較大的區域，普遍面臨經濟發展落後、社會問題突出、宗教與族群矛盾較多、政府治理低效等各種不穩定因素。[64]尤其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政治情勢不穩定，宗教信仰與意識型態衝突、領土主權爭議等問題導致政治衝突頻發，近來亦受到恐怖主義威脅，較易阻礙基礎設施發展與貿易合作，因此，如何避開政治矛盾、增進前述地區會員國合作意願，將是影響亞投行有效運作的重大挑戰。此外，目前亞投行共有 80 個會員國（亞洲域內 46 國，域外 34 國），地理範圍涵蓋全球五大洲，由於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涉及勞工利益、人權保障、環境保護等問題，必須設法在各會員國相關規範之間取得平衡，才有助於增進合作效益。[65]另亞投行融資領域

[63] 歐巴馬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發表國情咨文表示，有了 TPP，中國不是亞洲地區的規則制定國，而是美國(With TPP, China doesn't set the rules in that region, we do)，參見「談 TPP 歐巴馬嗆中國：亞洲規則是美國訂的」，**自由時報**，2016 年 1 月 13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570608。

[64] 趙崢，「亞投行的發展價值和面臨的風險挑戰」，**金融經濟（北京）**，第 3 期（2016 年），頁 13-15。

[65] 閆奕舟，「亞投行對於中國的意義及中國面臨的挑戰」，**現代商業（北京）**，第 24 期（2016 年），頁 85-86。

和制定標準皆係以亞洲域內的發展中國家為主要放貸對象，較易間接導致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從而降低亞投行的工作效率。[66]

**（二）會員國經濟發展與市場開放程度不同：**

基礎設施建設通常具有前期投資規模大、盈利周期長、收益不甚穩定或偏低的特徵，因此需要被投資國具有長期穩定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作為保障。[67]相關建設成效亦與各國的經濟、科技、人才等水準息息相關，例如：中國、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狀況較佳，人才、科技的水準相對先進，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亦較完善，相對而言，寮國、緬甸經濟發展則較為落後，在人力、物資方面都沒有足夠實力確保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可如期進行。另外，各會員國的市場開放程度與國際地位亦將間接或直接決定其在亞投行所能獲取的決策權力，從而影響在投資合作中的公平性與利益偏差。[68]

**（三）面臨外部政治壓力以及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競爭：**

亞投行的運作透明度與效率，是外界質疑亞投行能否進一步擴展，以及美國反對加入的主要因素；另外，亞投行是以營利為目的之多邊金融機構，決策機制係參考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制度設計，採取多數決投票方式進行表決，由於中國是亞投行的最大股東，並擁有 27.52%的絕對優勢之投票權力，未來中國要如何在確保對亞投行主導地位的基礎上，一方面避免「一票否決權」的投票權威，另一方面亦賦予亞投行更多的獨立性，藉以降低外界提出亞投行可能淪為中國政治需要的附庸之質疑，將是中國必須面臨的主要考驗。[69]同時，儘管亞投行強調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競爭關係，但由於亞投行的貸款對象、範圍與世界

---

[66] 王若彤，「論當前金融體系下亞投行面臨的機遇及挑戰」，**現代商貿工業（湖北）**，第 3 期（2017 年），頁 112。

[67] 趙崢，「亞投行的發展價值和面臨的風險挑戰」，頁 13-15。

[68] 夏偲雨，「亞投行面臨的挑戰和對策」，**企業改革與管理（北京）**，第 10 期（2016 年 5 月），頁 108。

[69] 陳銀忠、楊柏，「亞投行設立的戰略考量及國際評論」，**對外經貿實務（湖北）**，第 12 期（2015 年），頁 22-25。

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大致重疊，投資方向也相近，未來仍有必要採取聯合融資或其他具體作為，藉以凸顯亞投行與現有國際多邊銀行是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

## 第四節　小結

基本上，亞投行被視為有助減少亞洲貧窮的「中國方案」。在亞投行快速的成立過程中，各國積極申請加入成為創始會員國的考量因素，除著眼「一帶一路」沿線基礎建設的潛在商機與較為寬鬆的放貸條件外，也是為了要取得亞投行創始會員國的特殊決策權，期能擁有一些未來可用以制衡和影響北京的籌碼。以英國為例，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是英國與亞洲各國共同投資、分享國際金融經驗的途徑，並可取得參與亞投行重要投（融）資決策的先機；同時，亞投行引入「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模式，透過會員國出資以及私部門分擔風險與投資回報，動員社會資本，提高公共服務與產品的效率與品質，亦有助強化吸引歐洲等域外國家申請加入的誘因。根據《亞投行協定》第 28 條規定，每個會員國所擁有投票權的總數是基本投票權、股份投票權及創始會員國享有的創始會員投票權之總和；各創始會員國均享有 600 票創始會員投票權，使創始會員國可據此在亞投行啟動營運伊始，即擁有與其實際資金貢獻無涉的投票權力優勢，以及對亞投行決策的影響力。此外，亞投行成立迄今，已核准的貸款總額逾 20 億美元，放貸國家皆為創始會員國，並針對巴基斯坦和亞塞拜然等貸款項目，分別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合作，同時就環境和人權問題進行相關背景調查，相對有助消除在爭議地點進行不良交易可能遭致的質疑與潛在風險。

美國對於亞投行的態度，雖然在歐巴馬執政時期已從強烈抵制轉變為原則上不反對，但是迄今仍未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歸結歐巴馬政府反對亞投行的真正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長期的不信任，擔憂中國將藉資金管控間接控制相關亞洲國家，並利用經濟實力誘引這些國家向中國的政治發展軌道靠攏，進而弱化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政經影響力與控制力。

隨著中國總體國力提升，逐漸調整「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外交戰略思維，對於國際事務轉趨積極，利用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推動中國大陸發展，更被中共視為鞏固國內領導權力的關鍵要務。習近平主政後，在對外關係方面，相較過去幾位領導人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希望在國際舞台有所作為，並透由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創建亞投行，展現改善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企圖心，冀能成為國際規範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亞投行獲得亞洲域內（印度、南韓、新加玻、東協 10 國）與域外（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盟會員國及英國）國家支持並且正式啟動營運，顯示中共漸已具備主導建構區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機構，以及抗衡美國、日本、歐盟等經濟強權之實力；亞投行是否能與其他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發揮相輔相成的效益，目前仍有待觀察，亦潛存諸多必須克服的風險與挑戰，但卻也開始改變當前國際經濟制度由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主導壟斷之格局，並逐漸發揮稀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作用；設立亞投行是中國測試自身對國際經濟影響力的試金石，未來中國將可藉主導亞投行運作，加強連接「一帶一路」建設及區域經貿整合策略，支撐大陸內部經濟發展，拓展區域政經影響力，強化對國際規則制定權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話語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四章　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競合

中國發起與成立亞投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援助，並促進相關經濟產業合作。[1]由於亞投行貸款對象及功能與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向國際收支逆差或發展相對落後的會員國提供之融資援助、優惠貸款等範圍重疊，難免產生競合效應，進而改變由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所形成的國際經濟制度下之權力分配狀態。本章將對亞投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的組織結構、投票權設計及援貸條件進行比較與分析，從中歸納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與美中關係發展的影響和戰略意涵。

## 第一節　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權力分佈之探討

### 一、亞投行之組織結構與投票權設計

亞投行的管理架構區分為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及管理層（Senior Managemant），[2]分述如下：

（一）**理事會為最高決策機構**，由各創始會員國財政部長組成，擁有對亞投行重大決策的最終審批權，並根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簡稱《亞投行協定》）授予董事會和管理層相當權力，但不包含「吸收新成員國和確定新成員國加入條件」、「增加或減少亞投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員國資格」、「裁決董事會對《亞投行協定》的相關解釋或申訴」、「選舉董事」、「選舉行長、中止或解除行長職務」、「修訂《亞投行協定》」及「行使《亞投行協定》明確規定屬於理事會的其他權力」等

[1] 王宏仁，「大陸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觀察」，頁 14-17。
[2] "Governance," *AIIB*,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aiib.org/html/aboutus/governance/bog/Members/?show=1.

權力。[3]理事會應舉行年會，並按理事會規定或董事會要求召開其他會議；當 5 個亞投行成員國提出請求時，董事會可要求召開理事會會議。[4]

（二）**董事會負責指導亞投行總體業務**，由 12 位董事組成，分別來自 9 個亞洲域內會員國選區和 3 個亞洲域外會員國選區，董事會成員不得兼任理事會成員。中國作為第一大股東國，擁有單獨選區。[5]每位董事任期兩年，可連選連任，並應任命一位副董事，在董事缺席時，代表董事行使全部權力。董事會應根據亞投行業務需要，全年定期召開會議；若董事會主席或 3 名董事提出要求，即可召開董事會會議。此外，理事會應不定期審議董事會的規模與構成，並可採取絕對多數投票形式，適當調整董事會的規模與構成。[6]

（三）**管理層負責亞投行日常營運的具體工作**，由行長、副行長、首席營運官所組成，依據《亞投行協定》第 29 條規定，行長應為亞洲域內會員國的國民，任期 5 年，可連選連任乙次，行長另兼任董事會主席，並可參加理事會會議，但皆無投票權，僅在正反票數相等時擁有決定票；[7]亞投行現任行長為中國籍的金立群，5 位副行長來自英國、德國、法國、印度、印尼等亞洲域內、外創始會員國，分別是英國籍的亞歷山大（Danny Alexander）、德國籍的馮阿姆斯貝格（Joachim von Amsberg）、法國籍的隆格瑪（Thierry de Longuemar）、印度籍的潘迪安（D.J. Pandian）及印尼籍的拉克齊（Luky Eko Wuryanto），其中德國籍的馮氏曾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法國籍的隆氏原係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此外，南韓為亞投行第 5 大股東，原已推派南韓前產業銀行（Korea Development Bank, KDB）主席兼營運長洪起澤（Hong Ky-ttack）出任亞投行副行長職位，

---

[3]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3 條規定。
[4]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4 條規定。
[5] 「中國在亞投行佔 26%投票權，擁有董事會單獨選區」，**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1 月 10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18/c_128637968.htm
[6]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5 條規定。
[7]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9 條規定。

後因洪氏牽涉大宇造船海洋公司（Daewoo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 Co.）會計舞弊事件，遂改由法國籍的隆氏取代，並被外界解讀為中國對南韓同意美國部署薩德系統（THAAD）的經濟報復。[8]

## （四）投票權設計

根據《亞投行協定》第 28 條規定，亞投行會員國的投票權由股份投票權、基本投票權及創始會員投票權所組成。每個會員國的股份投票權等於其所持有的亞投行股份數；基本投票權佔總投票權 12%，由全體會員國平均分配；每個創始會員國共同擁有 600 票創始會員投票權，基本投票權和創始會員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約 15%。[9]此外，《亞投行協定》第 5 條規定，亞洲域內、外會員國認繳股本比例為 75：25，並參照各國 GDP 比重進行分配，隨著亞投行不斷加入新的會員國，中國和其他創始會員國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將被逐步稀釋，惟中國 GDP 佔亞洲 GDP 總量 1/3，即使亞洲國家全部加入，中國仍可藉持有至少 25%股份確保主導亞投行的優勢。[10]亞投行通過重大決議需獲得 75%的絕對多數票，按照現有各創始會員國的認繳股本計算，目前中國為最大股東，佔總認繳股本 32.02%，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 25.52%，[11]等同對重大議案擁有「一票否決權」；根據「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中國以放棄「一票否決權」爭取德、英等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12]中國副財長史耀斌對此表示，隨著亞投行

---

[8] 「亞投行公布 5 名副行長名單」，**聯合新聞網**，2016 年 2 月 6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10 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4/1492399；「亞投行韓裔副行長休職 法國人補位」，**大公網**，2016 年 9 月 20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10 日，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hk/mainland/text/2016/0920/25374.html；「韓國丟失亞投行副行長職位 首爾認為是中國對薩德部署的經濟報復」，**自由亞洲電臺**，2016 年 7 月 12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10 日，網址：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ko-07122016112606.html。

[9]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8 條第 1 款規定。

[10] 顧賓，「亞投行的治理結構」，**中國金融（北京）**，2015 年第 13 期，頁 61-63。

[11]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accessed June 26,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who-we-are/members-of-bank/index.html.

[12] 「中國放棄亞投行否決權」，**中時電子報**，2015 年 3 月 25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25000839-260108.

會員國數量逐漸增加，每一會員國持有的股份比例都會相對下降，所謂中國尋求或放棄否決權是不成立的命題。[13]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亞投行會員國總數已從 2015 年 12 月創立伊始的 57 國擴增至 80 國，期間受到巴西、南非、科威特、西班牙等 4 國未於《亞投行協定》規定期限（2016 年 12 月 31 日）內完成《亞投行協定》簽署程序，[14]致使渠等之認股比例暫不列計，以及巴西因執行削減政府開支措施，由原先承諾認購亞投行約 3.2 萬股之股本，大幅削減為僅認購 50 股等影響，[15]目前亞投行各個成員國之股份及投票權比例皆已相應進行調整，在出資額和投票權前 10 大會員國中，亞洲域內、外會員國比例為 7：3（亞投行前十大出資額及投票權成員國如下頁表 4-1）；全體亞洲域內、外會員國總認股比例為 79.16：20.84，總投票權比例為 77.26：22.74（亞投行域內、外會員國總數、總出資額及總投票權比例如下頁表 4-2）。此外，中國所持有的認繳股本比例，雖然已從亞投行創立時的 33.33%，下降為 32.02%，投票權比例亦由 28.69%減少為 27.52%，但是若與亞洲域內、外其他會員國相較，中國擁有的投票權比例，不僅超過亞洲域內排名第 2 至第 5 名會員國投票權比例的總和，亦大幅領先亞洲域外排名前 5 名會員國投票權比例的總和，由此顯示，中國實際上對亞投行掌控絕對優勢的投票權力。（亞投行域內、外前 5 大投票權會員國如下頁表 4-3）

[13]「中國否認放棄亞投行否決權」，**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 年 3 月 26 日，檢閱日期 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66306.

[14] 亞投行理事會依據《亞投行協定》第 58 條規定，同意巴西、南非、科威特、西班牙等國延後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通過國內批准流程，以完成正式加入之程序，參見："China-led AIIB gives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extra year to joi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8, 2017,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0c0f6f2-1384-11e7-b0c1-37e417ee6c76?mhq5j=e2.

[15] "Brazil Cuts Stake in China-Led Infrastructure Bank,"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2, 2017,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brazil-cuts-stake-in-china-led-infrastructure-bank-1494596694

## 表 4-1　亞投行前 10 大出資額及投票權會員國

| 排名 | 國家 | 出資額（億美元） | 認股比（%） | 國家 | 投票權（%） |
|---|---|---|---|---|---|
| 1 | 中國 | 297.804 | 32.02 | 中國 | 27.52 |
| 2 | 印度 | 83.673 | 8.99 | 印度 | 7.92 |
| 3 | 俄羅斯 | 65.362 | 7.03 | 俄羅斯 | 6.23 |
| 4 | 德國 | 44.842 | 4.82 | 德國 | 4.97 |
| 5 | 南韓 | 37.387 | 4.02 | 南韓 | 3.69 |
| 6 | 澳洲 | 36.912 | 3.97 | 澳洲 | 3.65 |
| 7 | 法國 | 33.756 | 3.63 | 法國 | 3.36 |
| 8 | 印尼 | 33.607 | 3.61 | 印尼 | 3.34 |
| 9 | 英國 | 30.547 | 3.28 | 英國 | 3.06 |
| 10 | 土耳其 | 26.099 | 2.81 | 土耳其 | 2.66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accessed June 30, 2017, https://www.aiib. org/en/about-aiib/who-we-are/members-of-bank/index.html.

## 表 4-2　亞投行域內、外會員國總數、總出資額及總投票權比例

| 項目 | 域內國家 | 域外國家 |
|---|---|---|
| 會員國總數 | 46 | 34 |
| 總出資額（億美元） | 73.614 | 19.379 |
| 總認股比(%) | 79.16 | 20.84 |
| 總投票權(%) | 77.26 | 22.74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accessed June 30, 2017, https://www.aiib. org/en/about-aiib/who-we-are/members-of-bank/index.html.

**表 4-3　亞投行域內、外前 5 大投票權會員國**

| 排名 | 域內國家 | 投票權（%） | 域外國家 | 投票權（%） |
|---|---|---|---|---|
| 1 | 中國 | 27.52 | 德國 | 4.97 |
| 2 | 印度 | 7.92 | 法國 | 3.36 |
| 3 | 俄羅斯 | 6.23 | 英國 | 3.06 |
| 4 | 南韓 | 3.69 | 義大利 | 2.62 |
| 5 | 澳洲 | 3.65 | 荷蘭 | 1.21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accessed June 30, 2017, https://www.aiib. org/en/about-aiib/who-we-are/members-of-bank/index.html.

## 二、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之組織結構與投票權設計

### （一）組織結構

國際貨幣基金的主要結構是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執行董事會（Executive Board）和管理層。理事會為國際貨幣基金最高決策機構，每一成員國地區有正、副理事代表，通常是該國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理事會於每年 9 月舉行會議。執行董事會受理事會委託行使理事會的權力，處理日常事務，由 24 名執行董事組成，每兩年選舉一次。領導層設置 1 名總裁（managing director）和 4 名副總裁，常駐美國華盛頓總部。國際貨幣基金總裁任期 5 年，由執行董事會推選，可以連任，其中 8 名執行董事分別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中國、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任命，其餘執行董事由其他會員國組成的選區選舉產生。[16]

[16]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IMF*,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世界銀行亦設有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執行董事會（Executive Board）和管理層。理事會為世界銀行的最高決策機構，各成員國可任命理事和副理事各 1 名擔任代表，具有決定接受或終止成員、增減核定股本、批准協議條款修正案等權力；[17]執行董事會由世界銀行集團行長（President）及執行董事組成。[18]常駐美國華盛頓總部，每週開會兩次。領導層設置行長，行長任期為 5 年，可以連任，通常沒有投票權，只在出現投票僵局時擁有決定權。執行董事以個人名義不享有任何權利，並且須獲得董事會授權才能代表世界銀行。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世界銀行的執行董事從 24 人增至 25 人。[19]副行長是主要管理者，目前還有 2 名執行副行長、3 名高級副行長及 24 名副行長。[20]

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董事會基本成員皆為股份最多的 5 個國家，每年舉行聯合年會。根據慣例，國際貨幣基金總裁（Managing Director）均為歐洲人，現任總裁係法國籍的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世界銀行行長在傳統上皆由美國提名的美國公民擔任，現任行長係韓裔美籍的金墉（Jim Yong Kim）。

## （二）投票權設計

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 12 條第 5 款規定，每個會員國的總票數等於基本票數與以份額（Quota）為基礎的票數之和。基本票數係以所有會員國總投票權加總之和的 5.502%進行平均分配，且應為整數；以份額為基礎的票數是按照各會員國持有份額，每 10 萬特別提款權分配 1 票。[21]世界銀行協定第 5 條第 3 節規定，每一會員國享有 250 票投票權，每持有股份（Share）1 股另增加 1 票。[22]

---

[17]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頁 1-44。

[18] 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係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金融公司（IFC）、國際開發協會（IDA）、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等 5 個機構組成；一般所謂世界銀行則係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等 2 個機構。

[19] "Boards of Directors,"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leadership/directors.

[20] "World Bank Group Leadership,"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leadership/managers.

[21] 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公式是以 4 個經濟變數的加權平均值計算，分別為 GDP（權重 50%）、開放度（權重 30%）、經濟波動性（權重 15%）及國際儲備（權重 5%），參見"IMF Quotas,"

根據前述兩協定對投票制度的設計內容，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皆係由基本投票權和加權投票權所組成，其中，基本票由會員國自動獲得且數量一致，影響不大，實際影響投票結果的是加權票，會員國貢獻的份額或股份愈多，所能擁有的投票權力也愈大。此外，該兩組織通過重大決議皆須獲得 85%的同意票，美國皆為最大股東，並分別擁有 16.53%（國際貨幣基金）和 15.85%（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代表任何重大決議若沒有美國的支持皆無法通過，此即為備受各國批評的「一票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組織結構與投票權比較表如下頁表 4-4）

## 第二節　亞投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援貸條件之異同

### 一、亞投行之援貸條件

亞投行的職能之一是「利用其可支配資金為本區域發展事業提供融資支持，包括能最有效支持本區域整體經濟和諧發展的項目和規劃，並特別關注本區域欠發達成員的需求」，[23]顯示其貸款將著重減貧、增長和發展等目的。在融資條件部分，亞投行僅設置原則性的規定，依據《亞投行協定》第 11 條規定，亞投行可以向任何會員國或其機構、單位或行政部門，或在會員國的領土經營任何實體或企業，以及參與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國際性或區域性機構或實體提供融資；在特殊情況下，經由亞投行理事會以超級多數投票通過，[24]可向其他業務對象提供援助；此外，亞投行將按照不同國家的個別條件，要求借款國的開發計畫需合法透明、保護社會與環境利益，但不會要求借款國為了獲得貸款而將企業私有化或放鬆管制，[25]明確排除不合理的政治條件。同時簡化內部審查和風險評估體系，

---

*IMF*, accessed January 19, 2017,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quotas.htm.

[22] 謝世清、曲秋穎，「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評析」，**宏觀經濟研究（北京）**，第 8 期（2010 年），頁 8-11。

[23]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 2 條第 2 款規定。

[24] 《亞投行協定》第 28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理事會超級多數投票通過指理事人數占理事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成員總投票權四分之三的多數通過。

[25] 「挑戰世銀 亞投行擬提供更寬鬆借貸條件」，**自由時報電子報**，2015 年 9 月 2 日，檢索日期：

藉以壓低成本和減少繁鎖的行政程序，靈活度較高。亞投行副行長潘迪安強調，亞投行只是簡化項目投資流程，並未放鬆項目審核標準，亞投行仍係採取國際化的投資標準。[26]

**表 4-4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組織結構與投票權比較表**

| 項目 | | 國際貨幣基金 | 世界銀行 | 亞投行 |
|---|---|---|---|---|
| 成立時間 | | 1945 年 12 月 27 日 | |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 會員國總數 | | 189 國 | 189 國 | 80 國<br>（亞洲域內 46 國，域外 34 國） |
| 資本額 | | 2,230 億美元 | 2,380 億美元 | 1,000 億美元 |
| 組織結構 | 理事會 | 各成員國任命正、副理事各 1 名<br>每年 9 月與世界銀行聯合舉行年會 | 各成員國任命正、副理事各 1 名<br>每年 9 月與國際貨幣基金聯合舉行年會 | 各創始會員國財政部長組成<br>每年 6 月舉行年會。 |
| | 董事會 | 24 名執行董事 | 1 名行長<br>25 名執行董事 | 9 名亞洲域內會員國董事<br>3 名亞洲域外會員國董事 |
| | 管理層 | 1 名總裁、4 名副總裁 | 1 名行長、數名副行長 | 1 名行長、5 名副行長 |
| 行長/總裁<br>(任期 5 年) | | 拉加德（法國籍）<br>(Christine Lagarde)<br>◎慣例：歐洲人擔任 | 金墉（韓裔美籍）<br>(Jim Yong Kim)<br>◎慣例：美國公民擔任 | 金立群（中國籍）<br>◎《亞投行協定》第 29 條規定，行長應為域內成員國的國民 |
| 投票權設計 | 決策流程 | 簡單多數、共識決 | 簡單多數、共識決 | 簡單多數、特別多數、超級多數 |
| | 投票制度 | 【基本＋加權】投票權<br>重大決議：85%同意票 | 【基本＋加權】投票權<br>重大決議：85%同意票 | 【基本＋股份＋創始會員】投票權<br>重大決議：75%同意票 |
| | 主導國家 | 美國（16.53%） | 美國（15.85%） | 中國（27.52%）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IMF*,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Boards of Directors,"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leadership/directors; "World Bank Group Leadership," *World Bank*,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world bank.org/en/about/leadership/managers;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accessed June 26,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who-we-are/members-of-bank/index.html; "Governance," *AIIB*,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aiib.org/html/aboutus/governance/bog/Members/?show=1;謝世清、曲秋穎，「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評析」，**宏觀經濟研究（北京）**，第 8 期（2010 年），頁 8-11；《亞投行協定》。

2017 年 5 月 10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431954。

[26] 「亞投行簡化流程，並非放鬆標準」，**每日頭條**，2016 年 8 月 19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10 日，網址：https://kknews.cc/zh-tw/finance/neg9j5.html。

## 二、國際貨幣基金之援貸條件

國際貨幣基金主要透過監督、貸款、技術援助和培訓等職能來達致促進國際金融體系穩定之目的，[27]並注重短期國際收支調整和危機援助。國際貨幣基金對陷入經濟困境、財政赤字國家，提供貸款援助或協助管理該國財政，受援國必須採取財政節儉（增加稅收、削減開支等）、貨幣政策緊縮（提高利率、限制信貸創造等）和進行結構性財政改革（私有化、放鬆監管等），這些要求對受援國的經濟主權構成實質性限制，惟受援國尤其是議價能力不足的小國或弱國，往往因急需危機救助而別無選擇。[28]

## 三、世界銀行之援貸條件

世界銀行著眼於中長期的結構性調整和減貧發展來制定貸款條件，貸款項目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扶貧、農業、環保、衛生、教育等領域，並設有專門審查機制，[29]其貸款標準包含經濟條件和政治要求，從危機管理到一般經濟決策，皆存在對受援國主權的干擾。[30]根據「歐洲債務與發展網絡」（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Eurodad）2006 年對 20 個低收入國家接受世界銀行減貧貸款（Poverty Reduction Support Credit）附加條件的評估，有 14 個國家的單筆貸款附加條件超過 50 項，有 3 個國家超過 100 項；附加條件最多的是烏干達，共 194 項，其中社會和環境條件 87 項、公共部門改革條件 72 項、金融和經濟改革條件 35 項。由於世界銀行對受援國加諸許多貸款附加條件，不僅造成受援國沉重的合規負擔，加上相關附加條件設計過於具體、僵化，易導致世界銀行過多

---

[27] 「聚焦基金組織：在亞洲低收入國家有所作為」，**基金組織概覽增刊（北京）**，第 35 期（2006 年 9 月），頁 17。

[28] 廖凡，「國際貨幣體制的困境與出路」，**法學雜誌（北京）**，第 4 期（2010 年），頁 197。

[29] 謝世卿、胡東，「亞投行的國際挑戰略應對策略」，**亞太經濟（北京）**，第 1 期（2017 年），頁 41-45。

[30] " World Bank and IMF conditionality: a development injustice," *Eurodad*, June 2006, pp. 1-30.

介入受援國的微觀管理。此外，世界銀行傾向將貸款與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等較不適當或有爭議的經濟條件掛鈎，故經常招致受援國的批評與不滿。[31]

**表 4-5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援貸條件比較表**

| 機構名稱 | 援貸條件要點 |
|---|---|
| 亞投行 | ◎僅設置原則性規定，不要求借款國透過企業私有化或放鬆管制來換取貸款。<br>◎簡化內部審查和風險評估體系，藉以壓低成本和減少繁鎖的程序 |
| 國際貨幣基金 | ◎注重短期國際收支調整和危機救助<br>◎對陷入經濟困境、財政赤字國家提供貸款援助或協助管理該國財政，受援國必須採取財政節儉（增加稅收、削減開支等）、貨幣政策緊縮（提高利率、限制信貸創造等）和進行結構性財政改革（私有化、放鬆監管等）。 |
| 世界銀行 | ◎著眼中長期的結構性調整和減貧發展，設有專門審查機制。<br>◎貸款標準包含經濟條件和政治要求，傾向將貸款與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等不適當或有爭議的經濟條件掛鈎。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廖凡，「國際貨幣體制的困境與出路」，**法學雜誌（北京）**，第 4 期（2010 年），頁 197；" World Bank and IMF conditionality: a development injustice," *Eurodad*, June 2006, pp. 1-30.。

## 第三節　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與美中關係的戰略意涵

2017 年 2 月 17 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指出，二戰以後，從美蘇冷戰到後來的美國獨大，許多國際制度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原有國際秩序弊端日益顯現，美國干預世界事務的意願和能力正在下降，並可能不再希望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轉而追求單邊主義、甚至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經過近 40 年的高速發展，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製造國、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利用外資國和對外投資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中國作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外交戰略也

[31] 廖凡，「比較視野下的亞投行貸款條件研究」，**法學雜誌（北京）**，第 6 期（2016 年），頁 22-30。

必須與時俱進，走出「韜光養晦」階段，不僅要多參與國際事務，做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而且還要做國際體系的貢獻者和引領者。習近平另強調，世界需要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謂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國際制度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32]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美中兩國實力出現明顯消長，全球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加深，導致國際體系權力分配出現改變。[33]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雖然透過對外貿易帶來強勢的經濟增長，使其經濟規模先後超越德國、日本，取得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大國地位，隨著中國在國際政治及經濟的影響力與日遽增，中國開始主動尋求符合其大國身分和國家實力的國際地位。美國擁有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一票否決權」，中國的影響力與其他中小國家相差無幾（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投票權前 5 大國家如下頁表 4-6），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號召成立亞投行，可以說是想要打破美國的束縛，增加其在亞洲地區和開發中國家影響力的表現。[34]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是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降低外匯儲備風險的重要手段。[35]持平而論，亞投行的設立確實對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帶來衝擊和挑戰，只是在現階段尚難以撼動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但是，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兼具國內經濟改革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等多重戰略目的，展現中國崛起的自信，以及追求國際新秩序的企圖，仍將有助提升中國在國際體系的影響力及話語權，亦可提高中國在制定國際規範的份量與重要性。

---

32 「習近平首提『兩個引導』有深意」，**中國幹部學習網**，2017 年 2 月 21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ccln.gov.cn/hotnews/230779.shtml.

33 楊惟任，「中共外交戰略發展歷程與習近平對外關係之分析」，**中共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48-61。

34 薛健吾，「亞投行正式營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頁 42-50。

35 王智盛，「分析中國大陸金融外交－亞投行對臺灣之影響」，**中共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106-112。

**表 4-6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投票權前 5 大國家比較表**

| 排名 | 國際貨幣基金 | 世界銀行 | 亞投行 |
|---|---|---|---|
| 1 | 美國（16.53%） | 美國（15.85%） | 中國（27.52%） |
| 2 | 日本（6.16%） | 日本（6.84%） | 印度（7.92%） |
| 3 | 中國（6.09%） | 中國（4.42%） | 俄羅斯（6.23%） |
| 4 | 德國（5.33%） | 德國（4%） | 德國（4.97%） |
| 5 | 西班牙（5.31%） | 英國（3.75%） | 南韓（3.69%）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IMF*, accessed January 10, 2017,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IIB*, accessed June 26, 2017, https://www.aiib. org/en/about-aiib/who-we-are/members-of-bank/index.html; 謝世清、曲秋穎，「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評析」，**宏觀經濟研究（北京）**，第 8 期（2010 年），頁 8-11。

中國創建亞投行主要目的不是要與美國對抗，而是追求自身的經濟發展。[36]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是北京國際政經大戰略的重要環節。[37]亞投行的成立受到中國內外兩個構面因素之驅動，對外構面因素是直接挑戰美國的全球經濟霸權，同時加速實現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願景；對內構面因素係有效紓解大陸產能過剩問題，及時對應中國經濟成長「新常態」急遽放緩的挑戰。[38]隨著亞投行的成員增多，中國佔股的比例會相應下降，但亞投行的代表性將更加廣泛，其運作亦可更加國際化。[39]亞投行不僅只是為發展中國家發聲，更是中國謀求對已發展國家所制定的國際發展規則擁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才是亞投行成立的真正用意。儘管目前亞投行的規模與影響力仍不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但其所具備的未來發展潛力和持續蓄積的政經影響力，仍將可助推中國擴展「一帶一路」戰略。

---

[36] 「中國設亞投行不是為對抗美國」，**中國評論新聞**，2015 年 3 月 29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6/8/3/5/103683599.html?coluid=93&kindid=15350&docid=103683599。

[37] Teymoor Nabili, "The new Asian bank and a new world order," *Aljazeera*, 29 March, 2015,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5/03/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150329074949552.html.

[38] 「亞投行打破壟斷 美無力抵制」，**旺報**，2015 年 4 月 1 日，版 12。

[39] Mercy Kuo and Angelica Tang, "China's AIIB and the US Reputation Risk," *The Diplomat*, April 16, 2015,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chinas-aiib-and-the-us-reputation-risk/.

## 第四節　小結

經比較分析與檢視相關制度設計，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亞投行的組織結構及投票權設計並無明顯差異，在組織結構方面，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亞投行皆設置理事會、執行董事會及管理層等三層治理結構，其總裁或行長任期皆為 5 年，亦皆可連任；在投票權設計部分，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亞投行分別係由美國和中國所主導，兩國皆擁有「一票否決權」的絕對優勢，可對各項重大決議結果充分發揮影響力；雖然中國一直主張以各國經濟實力來劃分成員國發言權和表決權的制度，背離傳統國際法「主權平等」的基本原則，惟中國實際上仍係以「借鑑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經驗和做法」為理由，援引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權力結構，設計亞投行的投票機制與自我辯護，此一作法固然可提升中國未來在國際經濟制度及國際體系的話語權與影響力，但也可能影響國際間對中國真實意圖的疑慮與負面觀感，促使中國必須強調其在亞投行的個別認繳股本和投票權比例將會隨著會員國數量增加而降低，藉由象徵性讓渡權力與分享利益的方式，試圖在形塑制度規範的過程中，強化亞投行在國際經濟體系的正當性；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慣例由歐洲國家輪流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則係由美國所指派，中國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雖然出資比重和投票權皆排名第三，但是卻仍無法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取得相對應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另亞投行現任行長為中國籍，其他 5 位副行長分別來自英國、德國、法國、印度及印尼等創始會員國，似亦有凸顯以中國為中心的多極權力分配意涵。

美國透由為全球提供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公共財，主導建構國際經濟制度，鞏固其霸權地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援貸條件限制受援國的經濟發展自主性，致使接受援助的發展中國家或落後國家長期積怨與不滿。亞投行的融資條件僅設置原則性規定，並簡化審查和風險評估程序，雖有助提高整體運

作效率及降低營運費用，但也相對較易衍生運作透明度不足、放款標準過低、訂單多係由陸企承攬等質疑。

中國憑藉經濟發展大幅提升綜合實力後，藉創建亞投行撼動由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所組成的國際經濟制度。亞投行的設立，凸顯中國「制定公平合理的全球新規則」、「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的戰略意圖，以及「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戰略評估，整體目標則是為了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與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並能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此顯示中國試圖改寫被美國價值觀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建立一套與西方建制並存的國際規則與多邊機制的戰略規劃，藉以制衡美國長期干預國際經濟制度公平運作的影響，進而推促國際經濟制度朝向對中國較為有利的方向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第五章　結論

從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由兩極體系朝向美國獨霸的「一超多強」體系發展，美國對於國際事務雖具有主導能力，但在全球各區域存在一個或十多個區域強權的情形下，仍必須與區域強權合作才效解決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重大問題。就長期而言，只要中國綜合國力成長的速度高於美國，必然會逐漸縮短與美國國力的差距，加上中國地處亞太的地緣優勢，對地區的影響力亦會隨著國力的提升而增加，然而，基於中國整體實力仍不及美國的現實與認知，為了在現有國際制度下和平發展並持續增長影響力，增強與美國合作、降低競爭帶來的負面效應，應是較為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考量和選項。

隨著整體國力日益強大，中國針對不同國際規則和制度，採取拒絕、接受或試圖改寫等應處作法，一方面受惠於國際經濟制度而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亦設法將國際經濟制度從「由美國主導」改變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模式，企圖在自我發展的同時，藉由籌設亞投行等可形塑全球經濟秩序之重要機構或國際倡議，以尋求從內部逐漸改變既有國際經濟制度，並同時從外部推動替代方案，期能擴大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範圍，提升對國際經濟事務的影響力。

經由探討美國和中國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戰略運用與互動情形，本論文認為，中國目前並不打算為了組建新的國際制度，而試圖與美國對抗，徒然消耗必要的戰略資源，但是，中國設法推動改進與完善現行國際經濟制度，以及試圖在亞洲建立一個加深周邊國家對其依賴、從而向中國靠攏的外部環境等作為，確實已對美國的利益形成挑戰，然而，中國深化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並不是為了挑戰或取代美國，而是基於形塑安全環境、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和提升自身國際地位等戰略目的，同時削弱美國在亞太區域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

力，增加美國與其盟邦遏制中國所需付出的成本與代價，並與美國保持「既競爭又合作」的均勢格局，從而實現其「兩個一百年」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1]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一、中共運用亞投行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力結構爭取相對利益

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觀察，國際經濟制度是權力分配的反映，其權力分配的結構代表某種權力競爭狀態，它決定國際經濟制度所能發揮作用的程度，也是展現權力或實現利益的一種形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憑藉強大的國家實力建構全球性的制度霸權體系，並運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組建國際經濟制度主導世界經濟發展，維護經濟霸權地位，使美國成為霸權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採取積極姿態參與和融入國際體系，基於經濟實力強勢崛起的大國自信，中國主張推動現有國際經濟制度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並主導創建亞投行作為反制美國經濟霸權的戰略工具，凸顯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的意圖和政策傾向。

美中兩國是當今世界的前兩大經濟體，在美國主導創建的國際經濟制度下，儘管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力已被提升為排名第三，所能發揮的決策影響力仍與居於首位的美國存在相當差距，美中雙方在結構中的權力分配只是略作調整，並未改變美國經濟霸權體系的「一超多強」結構，美國依然掌控絕對權力優勢。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現階段係以實現「兩個一百年」（建黨與建國百年）作為國家發展的主要戰略目標，並以「永不稱霸」、「世界多極化」等主張，[2]一方面避免成為體系霸權和承擔全球所需公共財，徒然消耗重要的戰略資源，另一方面亦採取創設亞投行在體系內組建「平行架構」的舉

[1] 「兩個一百年」：指在 2021 年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建黨百年」目標，並在 2049 年達到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建國百年」目標。

[2] 中國主張的「多極化」是指美國不應該壟斷國際事務的領導權，世界上所有大國對於國際事務都應有平等的發言權，並得到與其身份相稱的尊重。

措，爭取與其綜合國力相符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等相對利益，藉以鞏固其在美國經濟霸權體系下「首極」的位置，同時建設「負責任挑戰者」身分，[3]並在國際經濟制度的結構下，與美國保持權力平衡態勢。

## 二、亞投行支撐「一帶一路」與美國「亞太再平衡」形成戰略均勢

習近平於 2015 年 2 月 10 日主持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時指出，亞投行的主要任務是為了亞洲基礎設施和「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是要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做出補充，並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共有利益的發展。經檢視亞投行成立以來整體發展現況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和效益，顯示中國希望藉由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達到保持與周邊國家的和平穩定關係、降低周邊國家對「中國威脅論」所產生之負面效應等政治上的戰略目的。[4]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對外提出「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5]其主要訴求與內涵是擔負與實力相稱的國際責任，此與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擔負維護世界秩序與民主體制責任，以至於後來發展出全球性的大戰略治理模式有別，中國關注的是要確保週邊和平與穩定的環境，以順利推進其內部改革開放政策，遂決定採行與週邊國家「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發展策略。習近平 2012 年 7 月 7 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所舉行的世界和平論壇指出，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6]就生存安全角度來說，中國所謂「睦鄰、

---

[3] 張登及，「利用美中互動 強化我競爭力」，**聯合報**，2015 年 3 月 27 日，版 23。
[4] 王宏仁，「大陸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觀察」，頁 14-17。
[5] 邱坤玄、黃鴻博，「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頁 73-110。
[6] 「攜手合作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北京清華大學新聞網**，2012 年 7 月 7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7 日，網址：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9649/2012/20120709162326099128284/20120709162326099128284_.html。

安鄰、富鄰」的讓利舉措，實際上是藉由「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互動關係，完成自身的經濟發展目標。

為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中國亟需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籌建亞投行的戰略目的，正是運用對亞太區域提供「公共財」的讓利方式，淡化政治威脅與干擾，同時連結「亞太夢」和「亞太新安全觀」，與週邊國家形成經濟互賴的合作關係，並藉此提昇中國在區域事務的主導地位及影響力，確保中國和平發展的政經安全環境。

此外，為了改善在既有國際金融秩序的不利地位，中國在不推翻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的前提下，以亞投行援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切入點，改變當前由美國主導壟斷國際經濟制度的格局，逐漸稀釋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之影響力，以致美國產生被中國挑戰或取而代之的不安全感，並對中國將在崛起過程中如何處理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及其意圖感到擔憂，遂在歐巴馬政府時期採取加速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協議」、[7]增進與東協國家合作關係等作為來制衡中國，[8]藉以穩固在亞太區域的政經主導權。

## 三、美中關係維持「鬥而不破」的戰略平衡格局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長期掌控創設國際經濟規則和制度的主導權，並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後，持續要求中國接受和遵守相關國際規範。亞投行雖然對美國的歐亞盟邦產生磁吸作用，但是並未大幅改變現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美國仍可採取放寬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對援建各國基礎設施建設限制條件之作法，降低亞投行對既有國際金融結構的影響。

[7] 2015 年 10 月 5 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在美國亞特蘭大達成實質協議。其後歐巴馬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發表的國情咨文表示，「有了 TPP，中國不是亞洲地區的規則制定國，而是美國」。

[8] 2016 年 2 月 15 至 16 日，美國在加州首度主辦「美國與東協特別峰會」（US-ASEAN Special Leader’s summit），展現藉由拓展 TPP 增進與東協國家合作以聯合制衡中國之戰略意圖。

維持亞洲的區域平衡是美國對陸戰略的核心內涵。近年來中國對於提供區域經濟「公共財」之能力與意願上升，並以創建亞投行展露作為亞太經濟「公共財」的主要提供者之戰略意圖；基於亞太區域「安全靠美、經濟傾中」二元格局已然成形，加以川普堅持貿易保護主義和退出 TPP 談判，美國或將採取接受中國以亞投行等方式主導提供區域經濟「公共財」，同時與亞太盟邦加強雙邊經貿談判及深化區域經貿合作的「圍堵式合作」（congagement）戰略，與中國繼續保持「和而不同，鬥而不破」的競合關係，從而維持區域的穩定和權力平衡。

在亞投行的規模、營運範圍及會員國數目持續擴張與增加的情形下，相應將提升亞投行對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惟中國仍需設法賦予亞投行更多的獨立性，同時在確保取得亞投行主導地位的基礎上，平衡運用和發揮最大股東及「一票否決權」的影響力，避免遭致外界以「亞投行是滿足中國政治需要的附庸」等理由對其提出批判或質疑，並間接擴大與美國在國際經濟和投資領域的對立與衝突。

形塑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是美中經濟外交政策的利益交匯點。基於確保發展安全前提，中國利用美國資源投入不足的缺口創設亞投行，形塑穩定外部環境，藉以維護和延長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機遇期；同時順應亞太國家「安全靠美、經濟傾中」情勢，採取不與美國正面衝突的間接路線，以亞投行支撐「一帶一路」戰略連結歐亞「世界島」，與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形成「以陸制海」的戰略均勢格局，同時設法維持美中「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格局。

為了降低亞投行對國際經濟制度的衝擊和影響，美國採取提高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投票權重（由 3.8 提升為 6.09%）、將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佔 10.92%，排名第 3）、評估放寬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援建各國基礎建設限制及加大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資源投入等因應作為。

亞投行對美國的歐亞盟邦雖然產生磁吸作用，但其功能只是對國際經濟制度的補充與強化，美國仍可運用其所掌控的資源優勢和經濟能力，平衡和牽制中國在地區乃至全球日益增長的政經影響力。中國創建亞投行是從制度層面針對美國制度霸權的學習、修正與創新，基於爭取和平發展機遇期的現實考量，中國先從區域進行「試點」，以亞投行作為測試自身國際政經影響力的試金石，藉以降低制度運作風險和累積主導運作國際多邊機構的經驗，進而強化對國際規則制定權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發言權。

##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中國以創建亞投行輔助推動各國共建「一帶一路」，冀能實現維護能源安全、補充經濟成長動力，以及藉共享繁榮鋪陳「中國夢」的三合一目標。亞投行是否能夠順利推展，有幾點可再持續觀察。首先，亞投行雖係一個多邊投資平臺，惟中國試圖藉由出資權重主導亞投行，並運用亞投行的多邊性質稀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於中國意圖的戒心和疑慮之效用，仍有待商榷；其次，亞投行的商業營運模式，能否維持其資金之可持續性亦仍待觀察；再者，世界銀行為制衡中國憑藉亞投行發揮影響力所成立的「全球基礎建設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y, GIF），以及國際貨幣基金、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平臺與亞投行競合關係之後續發展，皆可再做進一步檢視。[9]此外，若美國與日本政府決定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中國將採取哪些因應作法，也是值得繼續關注的重要發展。

川普（Donald J. Trump）在 2016 年 11 月當選第 45 任美國總統後，其國安顧問伍爾西（James Woolsey）曾撰文批評歐巴馬政府反對亞投行成立是「戰略錯誤」（strategic mistake），[10]加以川普曾讚賞中國的基礎設施非常進步，美國的基礎設施卻相對落後，在國會演說宣示未來十年將投入 1 兆美元用以改善美國

[9] 黃美鳳，「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之戰略意涵」，頁 4-12。

[10] "US opposition to AIIB strategic mistake, says senior Trump advis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1, 2016,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44829/us-opposition-aiib-strategic-mistake-says-senior-trump.

的道路、橋樑、能源設施與網路等基礎設施建設，[11]並派遣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出席 2017 年 5 月 14、15 日在北京所舉行的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博明在會議期間宣布美國駐陸大使館已和美國企業共同成立「美國一帶一路工作小組」，作為美中在「一帶一路」協調合作的平台。[12]基於川普外交政策多以經貿利益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為主要考量，未來川普是否會藉由加入亞投行爭取對「一帶一路」的投資利益，同時換取中國擴大對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挹注，應可作為後續觀察指標。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1] "President Trump Again Called for $1 Trillion on Infrastructure-Without Many Details," *Fortune*, March 1, 2017,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fortune.com/2017/02/28/trump-congress-address-infrastructure-investment/;「未來十年基建 川普撥 1 兆美元」，**聯合新聞網**，2017 年 5 月 2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13/2438142。

[12] 「美國成立『一帶一路』工作小組　顯示更願意與中國合作」，**香港 01**，2017 年 5 月 15 日，檢索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s://www.hk01.com/國際/9125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參考書目

## 壹、中文部分

### 一、專書


Jack Donnelly 著，高德源譯，**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臺北：弘智文化，2002 年。

丹尼．羅伊（Denny Roy）著，周茂林譯，**崛起－中共與區域安全**。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5 年。

王杰主編，**國際機制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臺北：唐山出版社，2000 年。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 年。

王逸舟，**中國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王逸舟，**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王輯思等著，李英明、張亞中主編，**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臺北：揚智文化，2001 年。

王輯思，**大國戰略：國際戰略探究與思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

王學東，**外交戰略中的聲譽因素研究—冷戰後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解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中美戰略關係新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

尼克森（Richard Nixon）著，丁連財譯，**掌握時機(Seize the Moment)**。臺北：時報出版，1992 年。

卡羅拉・麥克吉福特（Carola McGiffert）編，陳孝燮譯，**美國政治印象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年。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年。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書局，2004 年。

江西元。**中國的世界還是世界的中國—中國外交文化本源與國際體系變化趨勢**。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臺北：五南出版社，1995 年。

宋德星主編，**戰略與外交（第二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 年。

肖歡容譯，David A. Baldwin 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李明峻、林正順編著，**國際關係與現勢**。新北市：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7 年。

李景治、羅天虹，**國際戰略學**。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李巍，**制度之戰：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

阮宗澤，**中國崛起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轉型**：共有利益的塑造與拓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0 年。

明居正主編，**國際關係綜論**。臺北：晶典出版社，2010 年。

周文重，**中美博弈與世界再平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周世雄，**國際關係—權力與制度**。臺北市：五南圖書，2000 年。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門洪華，**中國國際戰略導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

門洪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邏輯建構：理論、戰略與對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

柳劍平，**當代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著，任曉、張耀、薛晨譯，**帝國的悲哀：黷武主義、保密與共和國的終結（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美國註定能領導世界嗎（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約翰・米勒（John Milligan Whyte）、戴敏，**中美關係新戰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雙贏之路（China and America' s Emerging Partnership: A Realistic New Perspective）**。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

俞新天等著，潘世偉主編，**國際體系中的中國角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 年。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8 年。

倪建民、陳子舜，**中國國際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徐斯儉主編，**習近平大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限**。台北：左岸文化，2016 年。

翁明賢等編著，**新戰略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揚智文化，1999 年。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與現勢**。臺北：晶典文化，2004 年。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臺北：揚智文化，2009 年。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文化，2003 年。

陳偉華，戰略：思維邏輯與方法論。臺北：翰蘆圖書，2015 年。

麥艾文（Evans S. Medeiros）著，李柏彥譯，**中共的國際行為：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9 年。

鈕先鍾，**國家戰略論叢**。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出版，1998 年。

傅國良、曹炳揚，**懷柔的中國？中共對外關係**。臺北：海鴿文化出版，2004 年。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數位，2011 年。

楊永明，**國際關係**。台北：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楊潔勉，**中國外交理論和戰略的建設與創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過子庸，**國際關係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2 年。

**鄧小平文選（第 1 版第 3 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鄭保國，**美國霸權探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年。

蔡東杰、蔡明彥編著，**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台北：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2014 年。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China's search forsecurity）**。新北市：左岸文化，2013 年。

蘇嘉宏，**中國的自許與美國的期待：美國晚近的中美關係研究之取向**。臺北：五南出版社，1998 年。

羅清俊，**社會科技研究方法**。臺北：威仕曼文化，2008 年。

## 二、期刊

王若彤，「論當前金融體系下亞投行面臨的機遇及挑戰」。**現代商貿工業（湖北）**，第 3 期（2017 年），頁 112。

王啟明，「國際建制與霸權體系的維繫：以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分析」。**亞太研究通訊**，第 8 期（2010 年 7 月），頁 135-167。

王智盛，「分析中國大陸金融外交－亞投行對臺灣之影響」，**中共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106-112。

王緝思，「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北京）**，第 84 期（2005 年 10 月），頁 13-16。

何杰，「權力與制度—國際機制理論的現實主義分析」。**歐洲研究（北京）**，第 21 卷第 4 期（2003 年 8 月），頁 25-37。

何嵐，「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美國霸權」。**揚州教育學報（江蘇）**，第 22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39-44。

吳福成，「中國大陸推動建立多邊開發銀行的戰略思維」。**經濟評論**，第 188 期（2015 年 5 月），第 8-10 頁。

李世安，「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特里芬難題”」。**世界歷史（北京）**，第 6 期（2009 年），頁 4-15。

李瓊莉，「中國大陸周邊外交之政經作為—對外援助」。**中共研究**，第 50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157-163。

邱坤玄，「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美權力關係」。**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3 期（2000 年夏季），頁 4-14。

邱坤玄、黃鴻博。「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頁 73-110。

邱坤玄，「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美『中』互動」。**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1 期（2005 年 11 月），頁 5-8。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8 卷，第 2 期（2017 年 4 月），頁 1-44。

門洪華，「國際機制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178-187。

門洪華，「國際機制與美國霸權」。**美國研究（北京）**，第 1 期（2001 年），頁 74-88。

門洪華，「美國霸權與國際秩序：一項歷史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頁 37-73。

胡文秀、王瑋，「國際制度下的中美互動論析」。**社會主義研究（北京）**，第 2 期（2014 年），頁 164-170。

胡聲平，「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臺美『中關係的可能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5-20。

秦亞青，「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沿革」。**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7 期（2004 年），頁 56-63。

浦曉宇，「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再思考：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10 年），頁 25-27。

孫伊然，「亞投行、一帶一路與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外交評論（北京）**，第 1 期（2016 年），頁 1-30。

夏偲雨，「亞投行面臨的挑戰和對策」。**企業改革與管理（北京）**，第 10 期（2016 年 5 月），頁 108。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59-85。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政治學報**，第 40 期（2005 年 12 月），頁 115-148。

陳欣之，「崛起、挑戰與承繼霸權—崛起強權參與建構國際制度過程的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63-88。

陳宗巖，「臺灣參與亞投行的效益評估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研析**，123 期（2015 年 7 月），頁 21-28。

陳銀忠、楊柏，「亞投行設立的戰略考量及國際評論」，**對外經貿實務（湖北）**，第 12 期（2015 年），頁 22-25。

張敬新、蘇俊燮，「國際制度的霸權」。**國際觀察（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19-24。

張蜀誠，「既聯合又鬥爭：從亞投行看大陸的平行戰略與臺灣戰略選擇」，**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46 期（2015 年 6 月），頁 4-21。

張勝軍，「全球結構衝突與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危機－解讀伊拉克戰爭後的世界政治」。**美國研究**（北京），第 3 期（2003 年），頁 30-41。

郭可為，「崛起中的亞投行－中國提升全球領導力的試驗場？」。**中國經濟報告（北京）**，第 7 期（2015 年），頁 100-105。

閆奕舟，「亞投行對於中國的意義及中國面臨的挑戰」，**現代商業（北京）**，第 24 期（2016 年），頁 85-86。

舒建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國際金融秩序」。**國際關係研究（北京）**，第 4 期（2015 年），頁 15-26。

楊飛，「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演進歷程及其啟示」。**現代經濟信息（黑龍江）**，第13期（2010年），頁151。

楊惟任，「中共外交戰略發展歷程與習近平對外關係之分析」，**中共研究**，第51卷第2期（2017年3月），頁48-61。

黃美鳳，「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118期（2015年2月），頁4-12。

黃恩浩，「中國大陸在亞太區域的經濟魅力攻勢：對習近平經濟外交戰略之分析」。**中共研究**，第50卷第5期（2016年9月），頁26-41。

黃瓊萩，「關係平衡 vs.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58卷第4期（2015年12月），頁71-92。

葉自成、蔣立群，「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黨的文獻（北京）**，第6期（2011年），頁72-78。

資中筠，「百年思想的衝擊與撞擊」。**美國研究(北京)**，第4期（1996年），頁7-29。

廖凡，「國際貨幣體制的困境與出路」，**法學雜誌（北京）**，第4期（2010年），頁193-207。

廖凡，「比較視野下的亞投行貸款條件研究」，**法學雜誌（北京）**，第6期（2016年），頁22-30。

趙崢，「亞投行的發展價值和面臨的風險挑戰」，**金融經濟（北京）**，第3期（2016年），頁13-15。

劉笑瑜，「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過程及決定因素」。**當代經濟（北京）**，第17期（2011年9月），頁66-67。

蔡裕明，「美國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認知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研析**，第121期（2015年5月），頁5-11。

蒲俜，「中國和平發展構建國濟制度的途徑分析」。**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5 期（2016 年），頁 75-81。

趙永祥、吳依正，「從亞投行與一代一路看中國海外經濟版圖擴張與對臺灣經濟發展之影響」。**全球管理與經濟**，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99-118。

謝世清、曲秋穎，「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評析」，**宏觀經濟研究（北京）**，第 8 期（2010 年），頁 8-11。

謝世卿、胡東，「亞投行的國際挑戰略應對策略」，**亞太經濟（北京）**，第 1 期（2017 年），頁 41-45。

濱中慎太郎，「亞洲開發銀行、亞洲貨幣基金、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室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建區域金融制度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3（2016 年 1 月），頁 119-134。

薛健吾，「亞投行正式營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戰略安全研析**，130 期（2016 年 2 月），頁 42-50。

蘇長和，「重新定義國際制度」。**歐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9 年），頁 22-27。

顧賓，「亞投行的治理結構」。**中國金融（北京）**，第 13 期（2015 年），頁 61-63。

## 三、官方資料

王宏仁，「大陸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5 年 3 月，網址：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54151125376.pdf。

曾詩韻，「中國經貿概況」，**香港經貿發展局經貿研究**，2017 年 5 月 16 日，網址：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數據及指數/中國經貿概況/ff/tc/1/1X000000/1X09PHBA.htm。

「亞洲基礎設施銀行投資銀行協定」，**AIIB**，2015 年 6 月 29 日，http://www.aiib.org/uploadfile/2015/0814/20150814022339326.pdf。

「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全文）」，**中國外交部**，2016 年 1 月 16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32258.shtml。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 年 3 月 28 月，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 四、 媒體

人民日報，http://paper.people.com.cn/

大公網，http://finance.takungpao.com.hk/

FT 中文網，http://big5.ftchinese.com/

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

中國幹部學習網，http://www.ccln.gov.cn/

中國評論新聞，http://hk.crntt.com/

北京清華大學新聞網，http://news.tsinghua.edu.cn/

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rfa.org/

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ltn.com.tw/

法國廣播電臺，http://trad.cn.rfi.fr/

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index

## 五、 網站

中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http://www.ndrc.gov.cn/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

南南合作網，http://ecdc.net.cn/

# 貳、英文部分

## 一、書籍

Balwin, Davi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eetham, David *The Legatimation of Power*.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Brown, Chris.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ian Press Ltd., 1997.

Cerami, Joseph R. and Holcomb, James F., eds., *U.S. Army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 .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1.

Chen, An. *The Voice from China: An Chen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Berlin: Springer-Verlag Press, 2013.

Clawford, Robert.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rtmouth: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Dougherty, James E. and Pfaltzgraff Robert 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Longman, 2001.

Economy, Elizab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Goldstein, Joshua S.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senclever, Andreas and Mayer Peter and Rittberger Volk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kenberry, John G.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Keohane, Robert,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Knor, Klans. *The Power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Krasner, Stephen.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Young, Oran 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rotecting the Enviro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Waltz, Kenneth,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Seven Beidges Press, 2000.

## 二、期刊

Beckley, Michael.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Issue 3(Winter 2011/120), pp. 41-78.

Chin, Gregory T.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rospects,” *Global Governance*, Vol. 22, Issue 1,(January-March 2016), pp. 18-21.

Deng, Yong “Remold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0. 4-5 (2007), p. 863-903.

Friedberg, Aaron.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5(Sep/Oct 2012), pp.48-58.

Grieco, Joseph M.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alysis with an Amended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0, No. 3(1988), pp. 600-624.

Hoffmann, Stanley. “The Rules of the Gam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7), pp. 37-51.

Ikenberry, John G.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4,( Fall 1989), pp. 375-400.

Ikenberry, John G.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Winter 1998/1999), pp.43-78.

Ikenberry, John G.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1(2001), p.191-212.

Ikenberry, John G.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Jan/Feb 2008), pp. 23-37.

Mearsheimer, John.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Nye, Joseph 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Nov/Dec, 2010), pp.2-12.

Nye, Joseph S. “China’s Rise Doesn’t Mean War,” *Foreign Affairs*, Issue 184(Jan/Feb 2011), p. 66.

Keohane Robert O. & Martin, Lisa L.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 1(Summer 1995), pp. 39-51.

Keohane, Robert O.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 1-13.

Krasner, Stephen D.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Spring 1982）, p.185-205.

Krasner, Stephen D.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1991), p. 336-366.

Schweller, Randall 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72-108.

Schweller, Randall L. “Rational Theory for a Bygone Er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Jul/Aug 2011), pp. 460-468.

Stein, Arthur A.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Spring 1984), pp. 355-386.

Suettinger, Robert L.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2(Fall 2004), pp. 1-10.

Sutter, Robert. “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1(Winter 2003/04), p. 75-8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三、官方資料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09.

AIIB,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rticles of Agreement*,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basic-documents/articles-of-agreement/index.html.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Modernization of World Bank Group Governance, *Zedillo Commission Report: Repowering The World Bank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9.

IMF, *Governance Structure*, http://www.imf.org/external/about/govstruct.htm.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8.

World Bank, *Organization*,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leadership.

## 四、媒體

Aljazeera，http://www.aljazeera.com/

Financial Times，https://www.ft.com/c

Forbes，http://www.forbes.com/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

Reuters，http://uk.reuters.c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ttp://www.scmp.com/

The Diplomat，http://thediplomat.com/

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

Voice of China，http://www.voacantonese.com/

Wall Street Journal，https://www.wsj.com/

Washington 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五、網站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http://www.aiib.org/html/NEW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https://www.cfr.org/

Foreign Affairs，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http://www.nbr.org/

The World Bank，http://www.worldbank.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